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扩展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奚爱国 冯 泉 常本春 余 珽

袁建华 高 健 孙 丽 郭东升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步健

副主任 陈 锋 朱 杰 夏 涛 钱照亮

魏晓蕾

编 委 (按笔画为序)

韦 敏 李 业 李 军 吴元庆

张吉林 张思东 陈 思 姚华庭

郭晓东 龚万达 潘庆磊

主 编 朱 杰

副主编 陈 思

目 录

2025 年第 2 期 总第 154 期
双月刊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 辑 出 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吉 强
责 任 编 辑:蒋建忠 王天海 徐晓婷 杨 玲

本期特稿

新时代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核心要义与优化进路 / 代玉启 韩译心 4

统战理论与实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研究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代会报告及其相关文件为中心 / 张 楠 14

加强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辨析:时代要求、现实问题与实践进路 / 夏 涛 25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学理探析 / 汪守军 31

政党制度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优势、境遇及优化路径 / 刘华超 李伯腾 35

人民政协成立以来的发展逻辑及经验启示 / 金建明 42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采编平台网址:<http://jsyb.cbpt.cnki.net>
电 话:025-84287222

传 真:025-84287298 转 7221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千字文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 年 4 月 18 日
定 价:8.00 元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世界政治文明的原创性贡献 / 李玟萱	49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伟大的政治创造——基于政党关系维度 / 梁晓宇 李文迪	55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从改革开放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基于生产力的视角 / 朱文琦	61
人大代表家站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价值与实践路径研究 ——基于北京市人大代表家站建设的考察 / 赵 竞 钱周伟	68
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演进及实践路径 / 徐子轩	75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0 * 2025 - 02

新时代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核心要义与优化进路

代玉启 韩译心

摘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是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基础性工作,是统一战线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要求,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引领性、凝聚性和持久性。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既要从引领者与被引领者、引领性与自主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等方面理解方法前提,又要从政治引领、思想引领、价值引领和文化引领等维度把握内容体系,还要从顺应时代变迁要求、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推动文化交流交融等方面挖掘其价值功能。解决好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现实问题,需要从统一战线的时代使命及人的发展需求出发,在强化战略认知与政策教育等方面不断进行实践探索。

关键词: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核心要义;实践进路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胜利的显著政治优势,也是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坚持“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1],先后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时代,面对我国“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社会阶层更加多样,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样”^[2]

的新情况,统一战线团结奋斗的时代主题更加凸显,争取人心、汇聚力量的使命任务更加艰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4],“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政策举措”^[5]。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锚定了新坐标,为进一步画好同心圆、凝聚正能量提出了重要遵循。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作为统一战线的基础性工作,以鲜明的政

收稿日期:2025-02-07

作者简介:代玉启,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基本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韩译心,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3BKS1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治性、引领性、凝聚性和持久性，成为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的固本强基之举，成为新时代防范化解统一战线领域意识形态重大风险，解决人心和力量问题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有关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研究比较活跃，涵盖理论与实践类议题。已有研究内容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及相关重要论述的研究，涉及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科学思维方法、理论创新、鲜明特质等维度；二是针对无党派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党外知识分子等特定统战工作对象开展的研究；三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经验研究，包括对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参政议政、政治协商等的实践研究或案例研究。然而，面对新形势，聚焦“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这一议题的学理性研究仍有深入探讨空间。基于此，本文试图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明晰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多维内涵，进一步阐述其价值功能、现实挑战和实践困境，并从统一战线的内涵特征以及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出发，探讨全面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优化进路，为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提供“道”与“器”有机结合的实践指南。

一、新时代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核心要义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阐明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的中心地位及原则要求，为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提供了重要指引。新时代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核心要义，体现在方法前提和基本内容两个维度。

（一）新时代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方法前提

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是一门讲求方法的学问。毛泽东同志说过，“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6]。新时代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

必须认识和把握工作规律，紧扣引领的方法论内涵，处理好三对关系。

一是厘清谁引领与引领谁的问题。这事关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针对性。从语义学角度看，“引”意为指引，“领”意为带领，二者都有明确的目标性和方向性。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着力点，在于以先进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塑造统战工作对象的思想格局、精神境界和使命担当。因此，要成为引领的主体，必须具备先进性，即引领者只有在所需引领的方面具有先进性，能够掌握群众，才能带动被引领者跟随其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7]。一般意义上来说，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引领者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及其职能部门、模范人物等。而被引领者一般指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他们在引领者的引导和带动下，将个人专业优势与国家发展需求有机结合，为统一战线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因此，要从政治认同引领和个体发展引领入手，加强对统战工作对象的基本认知和具体实践进行引导，尤其要在责任担当方面强化对党外代表人士的教育引领。

二是把握引领性与自主性的张力。这事关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实效性。在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中，引领性意味着要确立普遍性原则和一致性的政治方向，而自主性则意味着要尊重统战工作对象在发展路径上的多样性选择。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统一战线工作指引政治方向、树立价值导向，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为统一战线工作提供方法指导，增强工作实效。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8]但强调引领性并不意味着抹杀被引领者的自主性，而是要在尊重统战工作对象主体性和多元价值诉求的基础上，将先进的思想政治观念如盐在水般地融入统一战线工作。而且，引领不是一引了之，而是

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注重自主性不是放任不管,而是需要引领者持续跟进统战工作对象思想政治状况的变化,对引领的内容和策略进行动态调整。

三是正视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矛盾。这事关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发展方位。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意味着以更开阔的视野、更高的站位审视问题^[9]。因此,就工作纲领而言,其呈现出理想性特征,即以最优质的主体、最先进的理念、最有效的方式达到最理想的效果。但同时我们要看到,在现实中,统战工作对象的知识水平、教育背景和信息获取渠道不同,他们对于思想政治内容的理解具有个体差异性,且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会影响工作对象的认知,因而难免存在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基于这一矛盾,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就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把握统一战线工作基本规律和被引领者思想政治状况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立足现实,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深化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中缩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二) 新时代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内容维度

思想政治引领的内容是实现引领目标的关键承载物,是实现思想政治引领从理论到实践转化的枢纽,具有完整的理论架构。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及其职能部门、模范人物等引领者在遵循统战工作对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统战工作对象进行政治引领、思想引领、价值引领和文化引领,使统战工作对象的思想政治水平得到提升,让他们始终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

第一,加强政治引领是首要任务,即巩固共同的政治基础。政治引领最根本的就是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要求统战工作对象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进而发挥好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

重要作用。在多元思潮相互激荡的社会环境中,需要坚持共同的政治基础不动摇,防止统战工作对象出现“离心”倾向。

第二,加强思想引领是基础,即注重党的思想理论阐释。根据统战工作对象的不同特点和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阐释。例如,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群体,通过理论阐释引导他们以先进理论武装头脑,补足理想信念之“钙”,并引领其在思想理论学习中做到常学常新。又如,对于宗教界人士,应尊重其宗教信仰,引导他们坚持爱国爱教,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弘扬宗教教义中积极向上、劝人向善的内容。

第三,加强价值引领是重点,即强化核心价值观教育。价值引领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当今社会处于重要的历史转型期,统战工作对象呈现出利益诉求多样化的特征。为了在统战工作对象之间协调利益关系、找到最大公约数,引领者需要自觉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铸魂的作用,引导统战工作对象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和价值追求。

第四,加强文化引领是纽带,即提升统战文化凝聚效能。文化能够为统一战线工作提供思想指引、精神动力。加强统一战线的文化引领,关键在于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强大作用。要以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为主题,推出具有感染力的精品文化活动,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营造融洽和谐的文化氛围,实现统一战线工作理念的可感可知,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以文化认同增进政治认同的目标。

二、新时代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价值功能

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事关国家安全和根本利益,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统一战线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10]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不仅具备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性功能，还具有顺应时代变迁要求、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推动文化交流交融的具体价值功能。

（一）顺应时代变迁要求，增强抵御风险机能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的背景之下，我国发展面临着更加复杂严峻的战略环境和战略形势，这要求统战工作对象增强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意识与能力。一方面，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有利于帮助统战工作对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对错误思潮和错误言论的辨别能力，增强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强调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促使统战工作对象在共同的价值基础上寻求利益平衡点，减少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有利于抵御各种敌对势力企图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风险。总而言之，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有利于引导统战工作对象把稳政治方向之舵、筑牢理想信念之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从而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

（二）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积蓄团结奋斗势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党组）、各领域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方面人才有效组织起来，把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凝聚起来，形成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11]。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是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是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体现，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有力之举，有助于将各方力量整合到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从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也是发挥统一战线智力密集、人才荟萃优势，提升党的强大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有效方式。在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政治协商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形式，集思广益，这有助于使决策充分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从而既能解决实际问题，又能以开放、民主、务实的政党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由此，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努力在社会各界中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积蓄起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创造历史伟业的强大势能。

（三）促进资源有效整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统一战线始终围绕党的使命任务来展开，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要旨，凝聚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必要资源，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有助于充分调动统战工作对象的主观能动性，进而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的社会资源整合功能。一是盘活存量，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统战工作对象内部同样存在资源配置不平衡的难题。尤其是处于体制外的群体，由于其组织性弱，往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资源相距较远，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难以得到与体制内成员相当的社会资源^[12]。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可有效引导社会各界成员关注特定群体的合理诉求，进而发挥各类群体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的合理倾斜和互补。二是扩大增量，增加社会资源供给。在统一战线秉承的“大团结大联合”理念下，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能够向社会各界充分展现统一战线高度的包容性，实现各类统战工作对象在人力、物力、智力等资源上的拓展。三是挖掘潜量，创造新的发展空间。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有助于搭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创新合作

平台,促使不同专业领域的统战工作对象打破彼此之间的信息壁垒,在生动活泼的合作氛围下获得原本难以获取的社会资源,从而超越陈规,推动行业发展实现新的突破。

(四) 推动文化交流交融,激发统战工作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13]解决人心和力量问题,有效途径之一就是交朋友。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有利于在联谊交友中推动文化交流交融。知识分子是生产力的开拓者、文化的创造者、知识的传播者^[14],党外知识分子是统一战线工作中宝贵的文化富矿。海外侨胞、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则能凭借广泛的海外联系网络与多元文化背景,搭建起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桥梁,这既有助于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理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又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对外展现中华文明形象。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大统战工作格局的站位越来越高、视野越来越宏阔,更加致力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层面扩大统一战线影响范围。引导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自觉参与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的科研攻关,可促使统战工作对象深刻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价值,充分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从而激发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动能,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在合作中实现互惠互利。

三、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面临的挑战与困境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思想观念的变化,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面临着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双重挑战,亟须解决战略认知、激励方式、联络机制和供需对接等方面的关键问题。

(一) 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面临的现实挑战

为顺应统一战线工作的科学化发展要求,需要正视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复杂性,从国内外

环境变化和统战工作对象特征等方面审视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面临的现实挑战。

1. 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

一是国际形势的冲击。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需要应对的意识形态斗争日趋复杂。一方面是国际格局的变动。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有所抬头,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很大冲击,部分国家频繁制造贸易摩擦,对我国发展施加无理限制,冲击着统战工作对象参与国际合作的信心。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渗透。部分西方国家通过互联网、文化产品等多种渠道,不断向我国渗透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冲击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动摇部分统战工作对象的理想信念。还有一些西方媒体恶意歪曲中国的发展成就,在人权、环境等问题上造谣抹黑,更有甚者鼓吹“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论调,干扰我国国际统一战线工作。

二是国内发展的压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使得部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面临增速放缓、效益下滑等问题,从而引发民营经济人士等群体对经济前景和自身发展的担忧情绪。同时,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下,部分传统产业面临转型升级压力,一些企业陷入经营困境。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结构变化,自由职业者、新媒体从业人员等不断增多,这些人员流动性大、组织化程度低,对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力量整合带来了较大挑战。

2. 统战工作对象的新特征

一是群体构成更加多元。随着党面临的任务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大统战工作格局正在逐步完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了新时代统战工作对象为党外人士,重点是其中的代表人士。统一战线工作范围主要包括十二类: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

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华侨、归侨及侨眷,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15]。与新时代以前的统一战线工作范围相比,《条例》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纳入党的统一战线联盟,并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纳入统一战线工作范围。统战工作涉及的领域不断延伸、工作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客观上给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精准化、分众化增加了难度。

二是社交方式网络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创造了人类生活的新空间,拓展了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新领域,逐渐成为意识形态交锋的最前沿,“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16]。虽然互联网的普及有助于增强信息搜集和传递的便捷度,但人们社交方式的网络化也带来多方面的挑战。首先,出现信息传播与管控方面的难题。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其中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内容一经传播即能迅速扩散,引发连锁反应,容易分散统战工作对象对思想政治引领核心信息的注意力,从而增加引导他们树立正确价值观、增进主流文化认同的难度。其次,沟通互动模式转变带来挑战。网络化社交多以虚拟形式进行,统战工作者难以通过表情、动作等非语言信息及时捕捉统战工作对象的思想状态及情绪变化,从而影响引领效果。最后,网络社交平台的普及丰富了统战工作对象参政议政的渠道,但对统战工作者综合运用政治传播理论,引导、教育、团结、联合广大网民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的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大挑战^[17]。

三是思想观念更加多样。统战工作对象中的不同群体受到自身经历、文化背景和经济利益等因素影响,形成了更加多样的价值取向。例如,统战工作对象中的部分青年的价值观念存在现实性、割裂性、游离性等多元化特征,“不可避免会在理想和现实、主义和问题、利己和利他、小

我和大我、民族和世界等方面遇到思想困惑”^[18]。又如,部分具有海外经历的党外知识分子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对西方理论体系依赖的潜在风险,亟须对其加强中华文化主体性教育和政治引领。新时代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要求对具有不同思想认识的工作对象实现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9],这些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的个体思想观念,反映着统战工作对象高度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容易导致引领者与被引领者之间、不同被引领者之间的沟通协调成本上升,从而加大凝聚价值共识的难度。

(二) 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实施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20]面对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外部挑战,统战工作者需要从实际出发,对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力量集中度、激励和考评体系完善度、对象利益诉求的有效满足度等进行理性审视。

1. 战略认知尚需深化,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力量有待加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显著特征,就是把统一战线放到党的全局和战略层面来部署。然而,当前“大统战”的工作力量仍有待加强。一是对思想政治引领重要地位的认识有待强化。部分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一定程度上存在不注重思想政治引领、党的领导弱化等问题。部分党员干部依旧存在“重党内轻党外、重业务轻思想”和“一手硬、一手软”等倾向^[21]。二是基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力量相对薄弱。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向基层延伸。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基层治理状态下,基层党员干部易将统一战线工作视为“隐性工作”。与经济建设、社会改革等“显性工作”相比,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重要性不够突出^[22]。同时,不少基层统战干部

身兼数职,工作精力分散,不利于深入开展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工作。三是少部分统战工作对象对统战工作认识不足,社会参与度低。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是聚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需要统战工作者与工作对象的积极参与和互动。然而,宣传不到位、统战工作平台吸引力不足、部分活动不够实用等因素,导致少数统战工作对象存在“政治冷漠”倾向,从而直接影响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质量和实效。

2. 激励制度存在短板,工作的责任落实和考核评价尚需完善

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是做人的工作,既需要应对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又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做好不同统战工作对象“组织起来”、联谊交友等工作。如不能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成效将会受到影响。激励是帮助统战工作者发挥主观能动性、挖掘潜在资源的着力点,可以缓和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难度大与资源有限的矛盾。但当前的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在激励制度方面仍存在短板。一是职业发展激励不足。部分单位统战工作者的职业发展路径与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成效的关联不够紧密。例如,当前高校大多缺少对统战宣传队伍的物质奖励、精神鼓励和升迁激励,导致统战宣传人员普遍缺乏干事创业热情^[23]。二是责任落实有待明确。在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中,各部门、各岗位之间的责任界定不够清晰。例如,在统一战线领域的舆论引导方面,统战部门与有关部门存在职责交叉,易产生“责任分散”现象,或因重复劳动而造成资源浪费。三是评价指标不够科学。目前,统一战线工作考核的评价指标更加注重形式和数量。例如,从举办统战宣传活动的次数、参与人数、微信公众号刊发的相关信息数量等“量”的层面设定主要考核指标,却较少在活动是否真正提升统战工作对象的思想认识、增强其政治认同等方面开展有效评估,未能从“质”的层面充分考察思

想政治引领效果。

3. 联络机制有待优化,统战工作对象的沟通与诉求转化不足

思想政治引领作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价值基轴和逻辑主线,只有深度落实、高位推进,才能真正产生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效果。但在实际工作中,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联络机制有待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诉求挖掘不够深入。当前的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方法仍相对传统,联谊交友的创新性工作方式或载体不足。例如,在与党外人士沟通时,一味地按照讲政策、取证据、说道理等传统方式与党外人士沟通,以管理代替服务的思维惯性依然存在^[24],而忽略了与其真正建立感情的必要性,未能对党外人士的关切与诉求进行挖掘和总结,从而限制了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广度和深度。二是诉求反馈渠道不通畅。部分统战工作对象的参与机会有限,向党委政府反映问题的渠道不畅。例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陪审员、特约监察员等群体中所占比重相对较低,网络人士政治吸纳比例更低^[25]。三是联络对象覆盖不均。当前,统战工作对象点多面广,部分组织化程度较低的工作对象容易被忽视,尤其是新兴领域的自由职业者等群体,尚未被有效纳入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联络体系。

4. 分层分类引导欠缺,引领方式与统战工作对象的需要难以适配

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需要针对特定工作对象的思想政治状况,采取因人而异、因群而异的方式方法。然而,当前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措施的针对性有待提升。一方面,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教育资源同质化配置现象较为普遍。部分统战工作者没能处理好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对于“求同存异”原则的落实度不足。例如,在面向党外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中,引领内容与不同青年的教育背景、身份背景契合度较低,因事而化、因时而进不够,缺乏全面、具体、有深

度的内容供给^[26]。另一方面,部分引领方式陈旧且缺乏精准性。有些民主党派基层支部在开展政治学习时只是宣读文件、抄抄笔记,导致学习效果不佳。有的统战工作者未能针对不同的统战工作对象采取差异化的工作方法、手段,而是依赖政策宣讲、集中理论学习、定期组织会议、上门走访等传统工作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对新兴领域统战工作对象进行思想政治引领的力度有待提升、方式尚需优化。对于分布广泛、工作节奏快的新经济组织从业人员,传统的工作方式很难适应他们灵活多变的时间和主要在“云端”、在路上的工作特点。对于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的统战工作,同样存在思想政治引领供需失调的问题。一些地方还在沿用老办法、老思路,缺乏谋划、缺乏创新、缺乏载体,不愿调整传统惯性工作思维与方式,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程度不够^[27],从而造成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沟通障碍。

四、新时代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优化进路

解决好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现实问题,需要从统一战线的时代使命以及人的发展需求出发,探索新时代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优化进路。

(一) 强化战略认知与政策教育

领导权问题从来都是统一战线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形成全党上下一齐动手、有关方面协同联动的工作局面。”^[28]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要以教育引领汇聚统战力量。一是提升统战工作者自身的政治战略素养。要强化党的历史、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学习,切实增强“越是做党外工作,越要心中有党”^[29]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将统战意识纳入执政理念,提升统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二是适应时代需要,及时推进统一战线政策教育。统战工作者既

要与时俱进,又要不忘本来,善于挖掘、研究和阐释中华民族优良政治传统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统战元素,并将其贯穿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过程。要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最新要求结合起来,在推进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教育中,引导民主党派成员等深刻认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不断增强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政治共识。

(二) 注重责任落实与评价激励

进入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复杂,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任务更加艰巨,对明确工作责任、改进评价与激励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是压实统战工作的责任链条。要紧紧围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目标,压实统一战线工作责任制,将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工作落实到具体岗位和人员,并做好辖区内统战工作对象的联系、服务和引导工作。二是构建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有效的责任落实需要科学的考核评价来保障。针对当前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评价重形式轻质效等问题,需要正确处理好潜绩与显绩的关系。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不是瞬时的塑造和改变,也不是形式的堆砌和虚设,而是一项团结人、争取人的工作,既有看得见的“显绩”,更有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因此,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评价体系要在适当采用量化评价、结果性评价的基础上,拓展质性评价、过程性评价途径,综合考虑思想政治引领的积极性、持续性和教育活动影响力等方面。同时,要注重与其他主体的互动反馈,广泛听取统战工作对象和社会各界对统战工作的评价和意见。三是拓宽职业发展激励路径。职业激励是对科学考核评价结果的重要运用方式。可依据各项考评结果,面向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工作者设计多条发展路径,根据考评中体现的性格特点、专业特长和工作兴趣来确定工作任务中的“系锚点”,选择与其能力相匹配的晋升和发展渠道,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证。

（三）优化人才联络与诉求整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联络机制。”^[30]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需要在面向广大统战成员的联络机制中找准联结线、扩大融合域。一是要完善人才政治吸纳机制，提升统一战线成员队伍质量。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即提出，“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31]。这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提出了底线和红线的要求。统战工作者要在坚守“分清敌友”这一底线的基础上，发挥好统一战线这一中国特色的“包容性政治”优势^[32]。这需要各级党委扎实落实“有意识把一部分优秀人才留在党外”的要求，不断拓宽优秀党外人才发现渠道，注重从新兴领域、基层一线选拔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社会影响力大的优秀人才。同时，要处理好广交和深交的关系，注重与交友对象建立“自己人”的持续信任关系。“特别是要交一些能说心里话的挚友诤友。想交到这样的朋友，不能做快餐，而是要做佛跳墙这样的功夫菜。”^[33]二是发挥典型引领示范作用，促进党外代表人士有效服务社会。统一战线中的党外代表人士在团结、引领广大同盟者方面，具有“一根头发带动一把头发”的重要作用。在党外代表人士选树方面，既要依托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等推荐代表性人士，又要借助社会力量、媒体报道发现在不同领域有突出表现的典型人物。在同党外代表人士沟通方面，统战工作者要帮助他们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升引领能力，使他们的引领示范作用更加贴合实际需求。三是深化诉求挖掘整合机制，增强思想政治引领的广度和深度。联络不只是浅层次、表面化的信息交换，而是需要通过思想引领和情感共鸣来提升“向心力”，使得思想政治引领既符合统战工作对象的实际需要，又能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可通过定期走访、问卷调查、网络平台调研等多种方式，广泛收集

统战工作对象的意见和建议，挖掘统战工作对象尚未明确表达或自身尚未清晰认知的潜在需求，并加强对这些诉求的分析研究，将诉求处理过程与思想政治引领有机结合。

（四）完善分众统战的实施体系

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是一项教育人、引导人、发展人的工作，不仅需要达成统一战线工作的一般性要求，还要以“具体的人”为出发点，不断完善分众统战保障体系，实现分类施策和精准施策的有机统一。一是把握统战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推动“全价值周期”引领。要立足不同领域统战成员价值观产生、发展、成熟的周期，针对同一对象在不同时期接受思想政治引领的规律和需求，完善前瞻性、系统性和连续性的思想政治引领策略体系。二是深入开展调研，实现精准分类施策。统战工作者要注重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和需要，灵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要结合互联网时代信息更新速度快的特点，创新调研方法，综合运用大数据分析、案例研究、实地调研等多种手段，深入了解不同领域统战成员的特点和需求，制定分层化、分众化、个性化的思想政治引领方案。对于具有特殊思想困惑、经历重大变故或处于特殊发展阶段的统战工作对象，可以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展开思想政治引领，增强其对统一战线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三是改进思想政治引领方式，打造多元服务载体。统战工作者要转变传统思想政治引领体系中的思维定式，推动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方式从“单一”向“多样”转变。可加强大数据、新媒体等技术的应用，将党的创新理论和统一战线的基本理念通过生活化、通俗化的语言表达出来，选择统战工作对象喜闻乐见的思想政治引领方式，把“大道理”讲成“小常识”，从“天下事”讲到“身边事”，让“有意义”的理论变得“有意思”^[34]。通过为民主党派成员设立参政议政直通车、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打造创业孵化基地等实践引领方式，激发统战工作对象主动融入的参与热情。

参考文献:

- [1][3]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7-02(2)、(2).
- [2][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28、133.
- [4][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29、29.
- [6] 毛泽东文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415.
- [7] 代玉启, 罗琳. 价值引领: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范畴[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1(5): 24.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十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91.
- [9] 叶方兴. 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域中的“价值引领”[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4(3): 118.
- [10][28]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N]. 人民日报, 2022-07-31(1)、(1).
- [11] 习近平.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不断把党的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J]. 求是, 2020(15): 6.
- [12][25] 王伯睿, 叶闽慎, 袁北星. 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 理论、现实与路径[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3): 105、105.
- [13]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72-173.
- [15]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5-6.
- [16]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45.
- [17] 王建国, 李济时. 新时代的网络统战: 挑战、策略和方法[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8(5): 70.
- [18]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2-05-11(2).
-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82.
- [2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理论学习中心组. 画出最大的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讲座[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5: 5.
- [21] 丁叶. 社会转型背景下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困境与创新路径研究[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5): 31.
- [22] 王洋洋, 李晋玲. 大统战工作格局下基层统战工作研究[J].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2): 38.
- [23] 杜薇. 试析如何加强新时代高校统战宣传工作[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9(12): 81.
- [24] 李腾. “四链”同构促进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效能提升研究[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4): 17.
- [26][34] 杨子瀚. 新时代高校青年统一战线成员思想政治引领的发展进路与实践策略[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2): 63、64.
- [27] 张俊, 莫岳云. 新形势下我国海外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对策研究——基于广州市留学人员的问卷调查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3): 69.
- [29] 习近平. 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97.
- [3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297.
- [31]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
- [32] 钱再见. “人心”与“力量”: 统一战线的政治使命与治理功能——兼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着力点[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 70.
- [3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04-305.

责任编辑: 王天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研究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代会报告及其相关文件为中心

张楠

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承载着体现党的思想、宣传党的主张、突破“话语围剿”、争夺话语主动等重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相关的理论语境、历史语境、文化语境和时代语境。在相关语境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为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为何革命”等一系列问题的回答,确定革命主体、明确革命对象、确立革命形式、厘定革命性质,并在此基础上设置了“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义”等话语议题。围绕这些话语议题,中国共产党在对马克思主义原著话语的继承上初建革命话语范式,在对“苏式话语”的批判中转变革命话语形式,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中丰富革命话语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明确革命话语指向,从而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话语的建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话语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代会报告;革命话语

近年来,学界从话语建构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热度持续攀升。相关研究成果大体呈两种趋势。一是以时间为线索,考察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百年演进,进而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二是基于党的话语中所包含的重要概念,如“人民”“阶级”“革命”等,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路径和理论成果。但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代会”)报告及其相关文件,是党的话语的官方表达和集中呈现,相关的学术研究仍留有余地。革命话语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党代会报告及其相关文件入手进行研究,不仅对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具有重要作用,还有助于从话语建构的视角探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答案。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语境

话语作为人类思想的载体和外在表达形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受到人类

收稿日期:2024-12-11

作者简介:张楠,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宣城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3BDJ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社会历史发展的制约。换言之,话语离不开与其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不能抛开相关的语境,孤立地谈话语的产生和建构。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因此,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就要将其放在相关的理论语境、历史语境、文化语境和时代语境中加以理解和把握。

(一) 理论语境: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和运用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旧唯物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果,是致力于实现无产阶级自身解放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该学说正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的观点,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中,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李大钊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时指出,“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3],突出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又如,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书信中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4],指出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改变中国面貌的重要作用。毛泽东也曾说,在看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等著作后,知道了“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5]。针对中国特殊国情,他进一步提出要“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6],从而开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具体实践。

如果说阶级斗争理论为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中国人民提供了思想武器,那

么阶级斗争蕴含着“团结”和“斗争”的双重逻辑,便为中国共产党人划分敌友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了“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7],进而“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8]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人以话语言说的方式,立场鲜明地将党的主张表达出来,并通过革命话语的传播来达到争取群众、突破话语围剿、赢得革命胜利的目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和运用,特别是对阶级斗争的相关理论的继承和运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 历史语境: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

中国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便逐步进入封建社会,虽经历数次王朝更替,但其社会性质没有变。然而,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性质发生了改变,中国被动地卷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体系之中,从此开启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探索现代化之路的征程。直至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后,代表着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接过落后国家探索现代化发展的接力棒,肩负起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重任。

何为现代化?就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9],而狭义的现代化则指落后国家“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10]。面对着国家蒙难、民族蒙辱、文明蒙尘的状况,中国的有识之士接连而起,为救亡图存和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多种方案。其中,既有农民阶级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地主阶级洋务派发起的洋务运动,也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的戊戌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这些运动虽然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历史

和实践证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救国方案均无法使处于黑暗中的国家走向光明,

“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11],带领人民实现现代化发展。在民族危机深重、探索现代化之路受阻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风雨飘摇的中国和处于苦难中的民族带来了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 100 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12]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13]作为最高纲领,写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向世界宣告自己的立场和奋斗目标。在马克思、恩格斯笔下,共产主义社会是在生产力充分发展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形态。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落后国家要实现共产主义,必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向现代化进军,使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因此,历经革命的淬炼,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明确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4]。由此观之,近代以来党带领人民群众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不断探索,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意,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提供了素材。

(三)文化语境: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思想文化如实用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大量涌入中国,不断地冲击着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进一步解放了思想,使民主和科学的理念深入人心。中西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造就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境。

文化语境对革命话语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以“革命”一词的词义演变为例,其经历了“中国创制的古典词、传入日本并发生演变、近

代日本借以意译西方词汇、日本译名‘革命’从日本逆输入中国”^[15]的过程。具体看来,“革命”一词在中国古代汉语中出现较早。《周易·革卦·彖传》中这样写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但这时“革命”的词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的表述存在着一定差距,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改朝换代。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进程加快,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概念才逐渐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此时的“革命”一词泛指革新旧制,并逐步被中国人所熟知和使用。不过在这一词义上的“革命”运动并未使中国人民摆脱苦难,却促使新的“革命”呼之欲出。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在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使更多的中国人有机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革命”一词的词义转向为暴力革命、阶级斗争以及推动社会进步等内容,实现了对“革命”一词释义的再次升华。正如毛泽东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6]。毛泽东的精辟论述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也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的传播打下了坚实基础。

可见,无论是中国古代汉语中对“革命”的释义、日本思想文化史上对“革命”的转义,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的定义,都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同样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正是在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中,雕刻出独特的思想文化印记。

(四)时代语境: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发展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17]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自然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人深知这一道理并强调,“明了现今世界大势,才能从受压迫的痛苦中加快的救出自己来”^[18]。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所处的国内和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得出“最近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19]的结论。正是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20]与“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21]两个相反趋势相互交织的时代境遇下,生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的时代语境。

回顾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不难看到自18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另一方面“资本”与生俱来的扩张性和增殖性决定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必然会进行海外殖民扩张。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采用战争、殖民等暴力手段,变本加厉地压榨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以实现自身的壮大。中国这一落后的东方大国成为西方列强眼中的宝藏,被多国觊觎、瓜分,没有逃脱被压迫、被殖民的厄运。面对着内无民主、外无独立的状况,中国人民经过多番努力仍无法实现自身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带来了希望。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为饱受殖民掠夺和压迫的国家提供了一条新的自求解放的路径,开启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处在这一时代浪潮中的中国共产党深知,“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23]。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人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自然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展开。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核心内容

革命话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党的一大明确指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24]。“革命”一词首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文件里,标志着以“革命”为主题的话语正式出场。“革命”往往意味着暴力行动,而“社会革命”则意味着通过变革旧的生产关系,达到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目的。面对着内忧外患、国难深重的国情,怎样才能实现党的主张,怎样才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中国之问”。随着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围绕着“革命”这一核心词,就“为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为何革命”等关键问题进行破题、解题,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革命话语的核心内容。

(一)“为谁革命”回答革命主体问题

“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是一个政党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可以表明政党的性质,展现政党所代表的利益阶层,而且能够明确政党的力量源泉来自哪里。关于“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作出了正面回答,即“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25]。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依靠无产阶级,成为党开展各项工作的基本遵循。在党的二大上,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26],明确了“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27]的纲领,制定了为工人和贫农利益奋斗的若干目标。党的三大宣言中也指出,“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28]是党的重要责任。由此可见,维护工农群众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工人和农民亦是中国共产党最为坚实的依靠。

中国共产党深知中国人民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亟须通过一场国民革命

来改变被压迫的现状。为了实现“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29]的目的，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了“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30]的主张，并号召全国革新党派组织起来共同反抗侵略和压迫。中国共产党深知国民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参与。因此，党的三大再次强调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在革命中所占的地位，指出这一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31]，要“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32]。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基于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整体考量，在党的三大上通过了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决议，并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积极地促成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统一战线的实践探索。国民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动员人民，广泛发动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革命群众参与革命，这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且使党的主张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虽然国民革命以失败告终，但经历了国民革命的锤炼，共产党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坚持武装斗争和争取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认识到扩大革命力量的重要性。

革命力量从何而来，换句话说革命的主体和主力军究竟是谁？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在对革命进行深入分析后告诉全党，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33]，贫农则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34]。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革命想要胜利，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35]。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一切抗日力量共赴国难，成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和保障。

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各革命阶级团结奋斗，才能战胜敌人、赢得革命胜利。由此观之，以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代表的最广大中国人民，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关于“为了谁、依靠谁”的一系列回答以及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主体的话语言说，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革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二）“革谁的命”明确革命对象问题

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36]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清楚地认识到，“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37]。因而，党的二大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并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近代以来中国的形势极其复杂，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尤为突出。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谋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一直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为革命的对象。直至在党的七大闭幕式上，中国共产党仍重申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两大大对象。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深入，毛泽东在 1948 年发表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将官僚资本主义纳入革命对象，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38]。

官僚资本主义被列入革命对象，这在党的五大时就初露端倪。国民革命期间，大资产阶级公然背叛革命，调转枪口屠杀共产党人，这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没有反对大资本家及封建势力的剥削之斗争与之相伴而进，是决不能发展的”^[39]，进而使中国共产党将

大资本家作为革命的对象之一。然而,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仅仅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虽然大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但是在民族危亡之际,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于抗日一线,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大资产阶级中有抗日意愿的那部分群体依旧是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团结的对象。因此,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将全部大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而是采用既联合又斗争的方式对待其中的坚持抗日的那部分群体,进一步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得到缓解,而代表着“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40]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官僚资本主义便成为革命的对象之一。由此可见,革命对象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对“革谁的命”的回答,抑或对革命对象的表述,便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革命话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

(三)“怎样革命”确立革命形式问题

对于“怎样革命”或者革命形式的回答,是革命话语建构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纵观人类发展史,社会革命既有以武力手段展开的暴力革命,也有采用温和方式进行的社会改良。然而,何种革命形式才是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实现自身解放的有效途径?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41],才能使无产阶级摆脱压迫,进而实现解放自身。这表明,暴力革命乃是无产阶级求得自身解放的有效途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42]。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正如列宁所言,“在十月革命中,苏维埃政权推翻了资产阶级,驱逐了旧政府,这种暴力,这种革命暴力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43]。

可以说,暴力革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处在黑暗中的落后国家进行社会革命提供了有力指导,为深受压迫的民族指明了前进方向。

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44]其中,武装斗争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学说的具体化表达,是中国共产党人付出惨重代价后得到的重要经验。党的一大就提出过具有明显暴力革命形式倾向的纲领。例如,“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45],“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46]等。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初创阶段,其早期活动以组织罢工、游行等工人运动为主,还未能领悟到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真谛。虽然这一系列的活动对促进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忽视了革命军队的建设,最终惨遭迫害。在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了南昌起义,开始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篇章。随后,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47]的重要论断,从而对“怎样革命”进行了回答,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形式为暴力革命。在党的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中,中国共产党再次强调,“最大限度的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48],“必须用武装暴动革命的方法”^[49]以及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政权等,进一步回答了革命形式的问题。

党的七大上提出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革命的具体纲领,“要求帮助沦陷区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要求允许中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保乡卫国”^[50]。可以说,暴力革命、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形式。中国共产党对于“怎样革命”的回答,或对革命形式的话语言说,便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四)“为何革命”厘定革命性质

“为何革命”指涉革命的任务,是厘定革命性质的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深知,“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51]。换言之,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中国共产党确定革命任务的前提。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52]。这段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此外,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指出,中国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53]。“半殖民地”一词首次出现在党代会的相关文件中,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是半殖民地社会的判断。在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后,党的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进一步指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54],这明确了中国是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可以说,党的六大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中国革命的性质由中国社会的性质所决定。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55]。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判断是“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早在党的二大,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有了这样的基本判断,但是在党内一直缺乏相对统一的认识。直至党的六大召开,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并在党的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中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56],进一步明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

诚然,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厘定,不能离开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和世界革命形势的分析。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

认识的逐步加深,毛泽东在 1939 年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57]。紧接着,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当时的革命,“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58],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提出,与无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起密不可分,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理性认识和科学总结。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即将临近,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总结道,“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59],并重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60],进一步清楚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

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代会报告及其相关文件的梳理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实践中通过对“为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为何革命”等关键问题的回答,进一步明晰中国革命的主体、敌友、方式、性质等,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话语支撑。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途径

在革命话语的建构中,中国共产党先后设置了“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义”等话语议题。围绕着话语议题,中国共产党在对马克思主义原著话语的继承上初建话语范式,在对“苏式话语”的批判中转变话语形式,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中丰富话语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明确话语指向。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伴而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中逐步被建构并丰富起来。

(一)在对马克思主义原著话语的继承上初建革命话语范式

“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

系,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61]也就是说,话语在社会学领域往往和权力交织在一起,在社会关系的建构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那么,如何促进话语和权力的相互转化?首先,需要在发生学的维度促进话语的生产;其次,需要在传播学的维度积极地进行话语宣介,以扩大话语的影响力;最后,需要在接受学的维度使话语背后所体现的思想更多地被群众所接受和掌握,进而转化成强大的革命动力来实现话语和权力的相互转化。马克思主义原著话语便是从发生学的维度,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将“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62]写入党纲。“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反映着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相关话语出现在党代会文件中。中国共产党通过沿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词句,对党的性质、革命的目的进行描绘,借助马克思主义原著话语的经典表达来阐释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合理性,成为革命话语初建时的一种趋势。

在马克思主义原著话语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将“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63]作为党的最高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把“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64]作为共产党人的使命,《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以为不断地向群众解释用什么方法,中国人民才可以脱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如何才能与世界劳农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是自己唯一的责任”^[65]。诸如“被压迫的阶级解放”“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解放全世界”等马克思主义原著话语,多次出现在党代会的相关文件中。中国共产党人借助马克思主义原著话语的基本表达,预设革命前景、阐述党的主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早期的革

命话语。

建党初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宣介下,革命话语得以在工人、农民、学生等社会群体中传播。革命话语所表达出的党的主张,逐步被更广大的群体所接受,为日后与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争夺革命话语权,进而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做好前期准备。中国共产党人在成长中,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原著话语转化为党的行动指南,在对马克思主义原著话语的应用和宣介中初步建构出革命话语范式,在革命实践中促进马克思主义原著话语向中国话语转变。

(二)在对“苏式话语”的批判中转变革命话语形式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共产国际的建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写下了恢宏的篇章。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建立,在党的二大上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一时期,党内很多事务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进行的,诸多行动都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这就导致党内在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用怎样的形式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上,缺乏明确的中国化指向,存在着照搬照用“苏式话语”的迹象。此时党内的主流话语,无法避免地存在着“苏式话语”的印记。

通过对党代会报告及相关文件的梳理不难发现,“苏维埃”“民族革命”“革命高潮”等具有鲜明苏式特征的话语频繁地出现其中,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鉴于对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经验的肯定和对共产国际权威的信服,出现对共产国际决议以及苏联经验概以神圣化的错误倾向。随着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果断地制止这一错误,反而继续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导致革命连遭重创。实践证明,套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开展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力行动在中国行不通,忽视中国实际而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运用也不行。

在同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斗争的过程

中,毛泽东总结了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之“的”的观点,并进一步提炼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重大命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66]此后,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具有中国风格的革命话语日渐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改变了“苏式话语”大量存在的局面。

在党的七大上,诸如“愚公移山”“礼尚往来”等具有中国风格、民族特色的话语的出现,不仅赋予了党的革命话语以中国形式,而且赋予经典革命话语以中国化的内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淬炼中不断成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化中国”的过程中实现了蜕变,在对“苏式话语”的批判中完成了转型和升华。

(三)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中丰富革命话语内容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问题。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带领中国人民拿起武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面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深受压迫和奴役的现状,党的二大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67],“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68]。此后,在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下,中华大地上进行了一场打倒列强和军阀的革命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虽然革命最终没有胜利,但由此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促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形势日趋复杂,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多重矛盾相互叠加,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叛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69]。可以看出,革命话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特定的指向性内容。随着抗日战争的白热化,日本帝国主义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革命话语便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更多地结合抗日救国的相关内容展开。当抗日战争进入到反攻阶段,党的七大发出了“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动员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为打败侵略者而战斗。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内容,在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进行着相应的调整,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赢得革命的胜利发出声音。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迅速成长、在革命的熔炉中不断壮大,而且在对近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中不断地丰富着革命话语内容。

(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明确革命话语指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离不开革命实践的土壤,也离不开具体的话语指向。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从党的一大笼统地将“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作为革命的目标,到党的七大强调“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前途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革命话语指向也在革命实践中更为明确。

党的二大在分析当时中国所处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制定了党的任务,即先组织和发动无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民主主义革命,接下来再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强调,“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70]。可以说,在这次党代会上,中国共产党预设了革命的前途命运,指出了革命的步骤。革命话语也围绕着革命任务,指向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的相关内容。但是在领导革命的实践中,当时党的领导人或因忽视国情盲目采取激进的暴力革命,或因对革命性质的机械理解而放弃革命

领导权,使中国共产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39年,毛泽东开创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命题,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前途命运有了更加科学的认识。在随后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更加深刻地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才是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这就使得革命话语指向了争取革命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党的七大延续了抗战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刘少奇指出,“为建立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奋斗”^[71]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这进一步明确了革命话语的指向。可见,“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等话语一经产生,便成为党内革命话语的具体指向。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议题产生的相关革命话语,一方面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围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议题衍生出的相关话语,也为日后革命话语的转意埋下了伏笔。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的许多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不仅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诸多素材,而且逐步明确了革命话语的指向。

四、结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话语的建构在宣传党的主张、突破“话语围剿”的基础上争取了话语主动,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坚实保障。通过审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不难发现这一过程既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守正创新、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推进,又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坚守理想信念、敢于英勇斗争的鲜明品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战略思想

指引下,需进一步推动革命话语和社会实践的双向互动,促成革命话语的时代性重构,从而助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 [1][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296.
- [2][22][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0、405、435.
- [3][4][7][8][13][18][19][20][21][23][24][25][26][27][28][29][30][31][32][37][45][46][52][53][55][62][63][64][67][68][7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97、448、1、1、133、126、126、126-127、127、127-128、1、6、131、133、277、133、139、277、263、132、1、1、139、147-148、132、1、133、277、133、133、133.
- [5][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八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02、602.
- [9][10]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2、13.
- [1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3.
- [12]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23-03-16(1).
- [14][40][50][59][60][7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二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77、171、161、199、199、349.
- [15] 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M].北京:中华书局,2004:539.
- [16][39][6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四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13、214、224.
- [1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

- 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9.
- [33][34][35][44][51][57][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六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832、831、833、677、822、834、834.
- [36][6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02、273.
-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五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49.
- [43]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7.
- [47][6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五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42、651.
- [48][49][54][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五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97、377、409、377.
- [61]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3.

责任编辑:杨玲

加强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辨析： 时代要求、现实问题与实践进路

夏 涛

摘 要:切实做好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防范化解统一战线领域意识形态风险,既是统战工作解决人心和力量问题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课题。当前,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对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的关注度不高、开展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的机制不够顺畅、对党外代表人士的意识形态教育培训力度偏弱等问题。需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强化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意识形态建设职能,提升党外代表人士抵御意识形态风险能力;发挥社会主义学院教育引导作用,扎实抓好党外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加强服务保障和考核,共同推动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出实效。

关键词: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学院

意识形态工作是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统一战线是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领域,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党外代表人士是我国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团结统一战线成员的重要桥梁纽带,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其意识形态建设的成效,关系到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巩固,关系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用的发挥,关系到团结奋进开拓活跃局面的形成。因此,切实做好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防范化解统一战线领域意识形态风险,既是统战工作解决人

心和力量问题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课题。

一、加强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要求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从发展态势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但经济运行也面临不少困难挑战,坚定信心、增进共识的任务更加繁重。从社会思想状况看,全社会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同时社会上一些焦虑倦怠的情绪有所增长,需要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凝聚人、激励人、抚慰人心。

收稿日期:2025-02-23

作者简介:夏涛,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一) 党外代表人士特殊的地位作用, 决定了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重要影响力

党外代表人士分布于各行各业, 掌握着一定的社会话语权, 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力。一是社会影响力。党外代表人士具有职业优势, 有的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有的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担任一定职务, 有的是新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引领者, 有的是网络大 V、意见领袖。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各领域、各行业中的精英乃至领军人物, 社会影响力较大。二是专业影响力。党外代表人士大多受过较高层次的教育, 往往在各自领域拥有深厚的专业背景、丰富的实践经验、较强的创新能力。他们凭借专业优势, 能够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为人民群众的疑难问题或生活需求提供帮助, 从而获得广泛社会认可。三是人格影响力。在统一战线发展史上涌现出一大批党外代表人士, 他们在家国情怀、道德品质、理想信念等方面展示出极高的人格魅力。这种影响力能够发挥行为示范作用, 激励公众效仿; 能够形成价值观传递效应, 潜移默化影响公众的思想; 能够产生情感共鸣, 建立情感连接, 从而影响公众的态度和行为。

正是由于党外代表人士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力, 如果他们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产生疑惑, 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缺乏自信, 那就会危及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危及国家安全。因此, 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以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加强对党外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引领, 教育引导他们始终保持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政治本色, 进而为保障国家安全打牢思想基础、筑牢思想防线。

(二) 党外代表人士鲜明的群体特征, 决定了他们更易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目标

新时代以来, 党外代表人士年轻化、高学历化、专业技术化趋势明显, 他们思维活跃, 接受

新生事物快, 更加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更加适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生存方式, 部分人处于体制外、单位外, 这些鲜明特征往往使他们容易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目标。一是思想观念更加多元。党外代表人士广泛分布在不同领域, 有着不同的职业背景, 其利益需求更加多样。他们的思想独立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 部分人强调自我意识, 崇尚多元价值, 对西方社会思潮的免疫力不强。二是政治参与广泛。党外代表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坚定拥护者和捍卫者, 中国共产党也将团结培养一批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亲密合作、经得起考验的党外代表人士, 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优势。广大党外代表人士参政议政热情高、能力强, 在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同时, 也易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想方设法接近并进行渗透的对象。三是对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够充分。相关调研显示, 党外代表人士中的一些人对意识形态工作认识不多、不深。有的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事, 与自己关系不大; 有的存在重经济利益而轻思想认识的倾向, 对意识形态领域激烈的斗争形势不敏感; 有的对社会上的错误观点、思想杂音不能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这些客观上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条件。

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已成为统一战线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关注的重点。这要加强党外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建设,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强化党外代表人士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识, 教育引导他们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并使他们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加强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现实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 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

但同时,统战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变化,各种西方错误思潮的冲击依然存在,社会思想观念领域的冲突、对抗依然存在,意识形态工作的薄弱环节依然存在,加强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明显加大、要求明显提高。

(一)对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的关注度不高

一方面,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从统战系统的网站信息发布、学习培训内容安排等方面看,涉及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还相对较少、针对性不够强。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2]的要求相比还有不足。另一方面,鼓励、引导党外代表人士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声还不够。面对各种错误思潮,以及一些刻意淡化、弱化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舆论等,党外代表人士在主流媒体中主动发声相对较少,面向社会开展宣传教育、进行舆论引导的作用发挥得不够明显。

(二)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机制不够顺畅

一方面,相关体制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健全。以民主党派为例,各民主党派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强化。有的党派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力量有限,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任务、内容、程序、保障等方面的规范性不够,这容易导致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的执行力不够强、效果不够显著。另一方面,部门协同机制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外代表人士的教育培养和意识形态等工作涉及不同部门,针对意识形态的大统战工作格局有待进一步完善。例如,宣传部门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管部门,具有较强的工作经验和资源,但与党外代表人士沟通联系不够紧密;统战部门负责党外代表人士的培养、推荐和管理工作,肩负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职责,但在相关工作资源、方式手段、队伍建设等方面还

存在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的成效;组织部门主要负责党外代表人士的选拔与任用,考察内容较为广泛,对意识形态领域有时关注还不够。因此,需要进一步整合相关部门资源、发挥各部门优势,强化大家共同来做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的协同机制。

(三)党外代表人士的意识形态教育培训力度偏弱

一是教育培训力量还存在薄弱环节。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承担着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的重要职责,但由于受师资和学科建设的制约,教育培训有效性、针对性不足。调查显示,省级社会主义学院的多数专职教师没有海外经历或背景,在面对具有相关经历或背景的党外代表人士开展意识形态培训时,不易把握培训对象接收信息的特征,培训方式较为单一,使得教学培训有时难以达到应有效果。二是针对性课程的设置还存在薄弱环节。社会主义学院开展的培训以政治共识教育为主,在课程设置中,有关意识形态理论与形势、意识形态建设等方面的专题课相对较少。同时,党外代表人士在社会主义学院培训时间较短,有时难以安排相关课程。三是针对性理论研究还存在薄弱环节。当前,针对性开展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研究的人员较少,各类学术研究机构关注这类问题不多。社会主义学院自身研究力量相对薄弱,在加强相关理论建设,为做好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学理性支撑方面,做得还不够到位。

三、加强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进路

(一)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依托大统战工作格局加强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统一战线最鲜明的特征。做好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掌握好、坚持好,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好、落实好,把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理论学习好、运用好,确保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不迷航、不偏向、不走样。二是压实主体责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统战部门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依托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完善意识形态会商研判机制,强化全局谋划,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与其他部门、其他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相互促进、融合发展。三是坚持各负其责。中共中央出台的《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对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作了总体安排与制度规定,划清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底线、红线,明确了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责任要求。就各民主党派而言,可参照中共的做法,建立意识形态责任制,细化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到具体人、具体事,层层传导压力,做到任务落实不马虎、阵地管理不懈怠、责任追究不含糊。

(二) 强化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意识形态建设职能,提升党外代表人士抵御意识形态风险能力

党外代表人士所在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是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要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作用,不断强化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建设。一是结合开展主题教育,主动把意识形态作为重要内容。近年来,通过开展“凝心铸魂强根基、团结奋进新征程”“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时代”“寻美·中国”等主题教育活动,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要结合主题教育自觉把意识形态建设纳入其中,

加强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引导,切实提高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引导党外代表人士善于从政治上判断形势、分析问题,敏锐洞察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各种现象,透过现象看清本质。特别是让他们在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西方宪政、新自由主义等西方错误思潮时保持政治定力,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划清是非界限,不被假象所迷惑,增强对各种政治谣言、灰色信息、负面消息的政治辨别力和免疫力。二是采取多种方式,上好意识形态专题教育课。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要切实抓好意识形态专题教育,不断增强党外代表人士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积极引导党外代表人士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各自所长,主动参与扶贫攻坚、捐资助学、慈善捐助等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用实际行动奉献慈善爱心。要做好相关典型的宣传工作,树立和宣传党外代表人士良好形象,发挥示范效应。三是准确把握思想动态,及时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要积极拓宽掌握思想动态的渠道,及时了解党外代表人士对党的创新理论、党中央的重大决策的看法,对各种社会思潮、道德观念、流行文化的认知,对国内外重大事件、舆论热点的反应,特别要关注他们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不断提升思想动态分析研判的精准度。对于一些模糊认识或不同意见,不能靠强制的手段加以解决,而是要用讨论、引导等方式去沟通思想、消弭分歧、分清是非;对于涉及重大原则问题的错误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严肃认真地进行批评教育,坚定政治原则、坚守政治底线,在团结中作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形成牢不可破的真团结。

(三) 发挥社会主义学院教育引导作用,扎实抓好党外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引领

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性质的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是社会主义学院的职责所在，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体现。一是发挥人才培养基地的作用，坚持不懈抓好理论武装。积极利用各领域代表人士培训时机，安排针对性意识形态课程。例如，开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新闻宣传与舆情应对”“领导干部媒介素养与舆论引导”等课程。同时，举办“形势与政策”报告会，邀请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围绕重要会议、重要文件精神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作报告，加强对党外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引领，发挥凝心育人的“联合党校”作用。二是发挥理论研究基地的作用，积极组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结合教育培训，组织党外代表人士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进行调研，鼓励他们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和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撰写调研报告、社情民意，提出意见建议等，让他们在调查研究、咨政建言中增进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同时，社会主义学院应通过设置课题、组织专题研究等方式，积极推动党外代表人士参与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让他们在理论创新中更好助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三是发挥方针政策宣传基地的作用，主动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紧密结合党外代表人士的显著特点，注重在多样性的需求中把握思想的共振点、挖掘情感的共鸣点、找准利益的交汇点，不断增强宣传内容的说服力、亲和力、感染力。注重通过党报党刊等传统主流媒体，发挥权威报道的影响力，同时又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兴媒体，在润物细无声中引导党外代表人士的思想意识。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进一步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中国的故事、改革开放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故事、中华民族发展的故事、统一战线发展的故事。在宣传过程中，注重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辨析、引导或斗争，把握时度效，敢于发声，善于解疑释惑，守住守牢

意识形态阵地。

（四）加强服务保障和网络舆论引导，共同推动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出实效

要按照统战工作“有效组织起来”的工作方法，对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坚持有组织、有保障、有检查，确保意识形态工作产生实效。一是坚持思想政治引领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坚持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原则，关注党外代表人士所思所想所求，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做到待之以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助之以实，把团结凝聚工作做到党外代表人士心坎上。坚持用团结的方法、柔性的手段来加强思想沟通，在潜移默化中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党外代表人士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同时，做好线上服务工作。利用好政协协商网络平台，拓展党外代表人士建言献策、反映诉求的渠道，推出一站式网络咨询服务平台，满足党外代表人士在政策法规、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各种信息需求。二是坚持网上与网下相结合。“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3]在网络空间这个主阵地、主战场上，能否守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到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推进网络统战工作，维护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是加强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的着力点。要牢牢守住网络阵地，创新开展网络统战工作，坚持网上听民意、聚民心，用党外代表人士喜闻乐见的方式和语言做好思想工作，不断拓展统战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坚持网上问题网下解决，重视与党外代表人士在线下开展面对面沟通交流，对他们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三是健全完善舆情快速反应机制。统战部门应主动牵头，探索建设与各部门联动、与互联网平台企业协作的大数据舆情监测平台，制定网络意识形态管理和舆情管控工作预案，强化对重大社会思潮的跟踪研究和辨析引导，增强对党外代表人士意识形态风险的预警、处置能力。四是积极发挥党外代表人士的网络正能量作用。教育引导他们对意识形态问题不搞无

原则的“一团和气”，面对错误言论旗帜鲜明表明立场，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4]。支持他们主动设置议题、正确引导舆论，让他们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上旗帜鲜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发声，在思想交锋中敢于亮剑，从而在网络思想舆论领域不断巩固扩大“红色地带”、转化“灰色地带”、压缩“黑色地带”，画好网上网下最大同心圆。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
-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 [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
- [4]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189.

责任编辑：吉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学理探析

汪守军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的集大成。这一重要思想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方针与政策等方面实现了重大创新,形成了一套涵盖统战工作各领域的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统战工作规律的深刻把握,蕴涵着丰富而深邃的学理。这主要体现在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系统全局观念三个方面。

关键词:统一战线;党的领导;重要思想;学理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内涵丰富,是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一重要思想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的集大成,蕴含深邃的学理。

从宏观上看,这一重要思想包括基本原理、基本内涵和本质、基本关系、地位作用等,体现为是什么、有什么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从中观上看,这一重要思想包括理论来源、领导力

量、指导思想、性质原则、战略定位、参与主体、目标任务、价值取向、实践基础、范围对象,以及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根本途径、基本方法等。从微观上看,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体现为“十二个必须”,构成了指导新时代做好统战工作的“四梁八柱”,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蕴含着深刻丰富的学理。“四梁”,即必须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必须把握做好统战工作的规律、必须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四梁”清晰阐明了统一战线的本质和根本要求:明确了新时代爱国

收稿日期:2024-09-17

作者简介:汪守军,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重庆研究基地研究员,重庆社会主义学院研究室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中共党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道理学理哲理研究”(SWTZB2024-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统一战线本质特征是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明确了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必须坚持的根本方针和基本原则；明确了必须把握做好统战工作的规律。“八柱”即其余的“八个必须”，指向统一战线 12 个方面工作范围，明确了统一战线的地位作用，即统一战线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和凝心聚力的强大法宝。

这一重要思想的学理也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指出了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主要任务、领导力量、工作要求等，贯穿其中的鲜明主线是坚持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既直接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又蕴含深刻学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开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两个结合”基础上的重大飞跃，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最新成果。这一重要思想在统战工作领域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方针与政策、制度与机制等方面的重大创新，形成了一套涵盖统战工作各领域的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是新时代做好党的统战工作、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的根本指针和遵循，是实现中华儿女大团结大联合的理论指导，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一是增强了党员干部对统战工作极端重要的认识，提高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推动统战工作与党在新时代的中心任务紧密联系起来。二是提出了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基本思路、路径和方式方法，阐述了统战工作的机遇与挑战、方针与任务、工

作重点等，有利于党在具体工作实践中着眼统战工作实际，推动统战工作实践创新。三是促进了统战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发展，提升了党领导新时代统战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四是这一重要思想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又经过实践的检验，成为较为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从而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这个联盟实质上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具有思想政治基础的一致性、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价值理念的一致性、目标追求的一致性特征。为了保障统一战线发展的稳固和正确政治方向，做好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就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对党的百余年统战工作实践经验的准确总结，是党对统战工作规律的深刻把握，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纲和主线，是这一重要思想学理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组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1]。1937 年 5 月召开的由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领导权的重要性^[2]。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3]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实现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路径和条件：一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二是依靠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

三是依靠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四是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并在政治上教育提高同盟者，二者缺一不可。1979年8月召开的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确立了统战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强调了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等重要问题^[4]。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第十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以来，党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从政治意识和战略方位高度重视统战工作，把统一战线看作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统战工作作为党委工作的重要一环，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带头做统战工作，参加统一战线的重要活动，模范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广交、深交党外朋友^[5]。这一时期，坚持党的领导仍然是统一战线的核心问题^[6]。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统战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对加强和改善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进一步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包括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和切实抓好统战工作、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要“四个带头”等^[7]。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统战工作，明确提出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两次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颁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及相关文件等，其中的核心和主线就是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全面领导。例如，《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统战工作的首要原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8]，要“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保证统一战线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9]。为了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全面领导，从党中央到地方党委均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地方党委领导统战工作的主体责任以及必须承担的七项主要工作职责。

三、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实现大团结大联合需要坚持统战工作原则，坚决执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贯彻落实好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处理好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潜绩和显绩、原则性和灵活性、团结和斗争这四对关系，并采取正确的工作方法，讲究统战工作艺术。在实践中，要发扬民主，以民主协商的形式，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尊重、照顾和维护同盟者的利益，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从而凝聚共识，筑牢共同的政治基础，把广大党外代表人士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还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新时代的爱国统一战线涉及方方面面的党外人士，涉及各族群众，涉及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是把他们广泛团结起来，共同推动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需要。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系到统一战线“五大关系”是否健康稳固，也必然关系到统一战线内部思想政治共识是否牢固，进而涉及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发展的过程，是各民主党派、各族各界群体有序政治参与的过程，是不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也是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巩固思想政治共识、凝聚人心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助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坚持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体现。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不是靠强制和施压，而是靠平等协商、充分尊重、有效沟通、尊重照顾和维护同盟者利益来形成共识。

四、坚持系统全局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体现和反映了系统论理念和新的政治格局观，具有深远的政治战略作用。

一是蕴含了新的工作格局观和全局观。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

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统一战线攸关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攸关党长期执政安全,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需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统战工作不仅仅是统战工作部门及统战干部的工作,而是全党的工作。要按照统战工作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真正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

二是蕴含新的政治战略观。这一重要思想提出了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这一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中如何处理同统战工作对象及其代表人士的关系问题,即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这与中国主要社会矛盾的新变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新任务、国内国际新形势等所带来的统一战线时和势、统一战线内部构成变化等密切相关。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处理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立足这个时代背景和历史方位,以高远的政治站位,体现出善观大势和胸怀全局的战略格局。这就需要在广大统战成员中广泛凝聚人心和力量,同时还要发挥好海外侨胞在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壮大知华友华力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以上既反映了爱国统一战线在新时代党的总路线总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统一战线作为我们党争取和凝聚人心力量的政治优势能否在新时代传承好发展好的重大问题,以及统一战线能否更好发挥“三个更加重要”作用的重大问题。

三是体现了一种新的世界格局观。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导下的统战工作,既能够更好地把广大统战成员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构建中华民族命

运共同体,又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思想的格局和胸怀超越了狭隘的国家民族界限,从国际战略视野、从全球范围反映了一种新的世界政治格局观,倡导、坚持和维护全人类共同价值,将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新变化产生积极影响。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学理深刻体现在它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上,体现在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重大战略作用和时代方位上,体现在统战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上,体现在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深刻洞察上,体现在这一重要思想所彰显的理论创造力、真理感召力、历史穿透力、时代洞察力、政治引领力和实践推动力上。因此,这一重要思想具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重要职责和使命。同时,这一重要思想的学理不仅体现在以上几方面,还包括明确的指导思想、鲜明的时代特色、丰富的学术内涵,并涉及进一步推动完整理论体系的构建,如理论来源、五大关系、基本原则、参与主体、工作领域、思想方法等。总之,深刻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道理、学理、哲理,有助于更好发挥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作用。

参考文献:

- [1][2][4][5][6] 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7: 30、75、348、422、479.
- [3]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42.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580-581.
- [8][9]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21: 6、8.

责任编辑: 王天海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优势、 境遇及优化路径

刘华超 李伯腾

摘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在价值指向上体现的利益代表“人民性”、在话语创制上反映的党际关系“合作性”、在话语功能定位上内含的决策方式“科学性”，既是对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超越，也是对其比较优势的充分彰显。当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话语生成、话语创造、话语传播等维度仍然面临着理论与话语供给不足、议题设置与话语说服力不强、话语引导与传播工作不力等诸多挑战和问题。优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就是要通过不断深化“两个结合”和理论研究，加强话语创造和议题设置、话语传播和话语引导，持续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着力提升制度元话语供给和话语说服力，最终形成具有广泛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党政治；话语体系；话语权

一般而言，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主要是以一定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为基础，以不同的地域文化（文明）特质和地域政治实践为底色与支撑，以相关政党制度话语概念、话语内容、话语传播、话语表达、话语功能等为基石，按照科学、严密与富有逻辑性的规则建构而形成的政党制度言语概念集合体和话语表达传播体系。它是相关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与呈现形式，是对一定历史时期政党政治实践的

产物和不同地域文化（文明）特质的反映，受不同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制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它也是一个政党、阶级、民族、国家在思想文化软实力领域确立话语引领力、号召力、影响力并获得广泛认同的重要条件。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立在西方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深厚根基之上。“自由民主”“分权制衡”“政党轮替”“竞争性选举”等概念是其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核心构成。当前，西方政党

收稿日期:2024-12-27

作者简介:刘华超，信阳师范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山东大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基地研究员；李伯腾，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研究”（23JZD029）、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长期执政视域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实践与创新研究”（2023BDJ015）、信阳师范大学青年骨干教师支持项目“长期执政视域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2022GGJS—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制度话语体系凭借其政党政治理论的先发优势，在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学术范式等方面享有话语霸权。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为基础，是有关中国政党制度的言语概念集合体和话语表达传播体系。它既有鲜明的独特优势，也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建构系统、科学、完善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不仅有利于充分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治理效能，也有利于中国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形塑与传播。因此，直面中西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共同属性与重要差异，充分借鉴和汲取全球政党政治实践孕育创造的有益成果，全面建构和优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制度治理效能，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独特优势

(一) 话语价值指向：体现着利益代表的“人民性”

一般而言，政党制度产生于民主政治运行过程之中，是推进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完善的重要载体与制度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在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中，作为判定和确证政党政治前景目标、价值归属、利益导向的民主政治话语，必然是所有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中心议题。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长期实践及其反映的民主政治话语体系中，含有不同于西式民主的新的民主形式与民主实践，这充分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民主属性与制度实践中始终强调的利益代表“人民性”。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实践也充分表明，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政治载体与制度保障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真实、广泛、持久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1]，

是对“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2]程式化虚假民主的彻底否定。所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新”在于其话语体系内含政治参与的广泛性、真实性话语表达与利益代表“人民性”的价值指向与追求。它契合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并使二者有序衔接、紧密融合。它要求把个体利益、特殊诉求和整体利益、共同需求相统一、相结合。与此同时，在人民整体内部，也注重区分和找到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不同性、差别性，目的在于能够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这在理论上、事实上否定了任何容纳特权阶层、团体、组织和个人的话语空间。

从政党性质来看，中国共产党来源于人民，植根人民，始终代表着国家和人民利益，各民主党派以相应界别为标识，最大限度地联系和团结各阶层、各领域、各行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劳动者和爱国者，提出和反映具体政治议题与利益诉求，代表和实现不同界别的价值追求。由此看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旧式政党制度相比，做到了既致力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又兼顾维护少数群体的利益。当前，其利益代表的“人民性”价值指向，以及广泛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制度特质，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积极因素，围绕群众反映强烈、需要及时回应解决的急难愁盼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加强协商监督、提出意见建议、防范风险挑战，并能够将不同社会力量纳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同时，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拓展了建构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丰富素材。

(二) 话语创制贡献：反映着党际关系的“合作性”

在西方话语体系和话语霸权中，党际关系反映的只是政党之间执政与在野的竞争性关系，政党谋求的是执政地位，追求的是一党一派之私。与之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反映的党际关系，“和”与“合”是其精髓，呈现了各党派之间和

谐共存、美美与共、共荣共生、长期合作的亲密友党关系，即党际之间的合作性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始终处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地位。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具体体现为“三好”（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各民主党派通过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方式行使职能，与执政党一道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其中，“好参谋”重在阐明各民主党派在咨政建言、提出意见建议、出谋划策等方面的职能，这有利于确保重大战略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性、正当性；“好帮手”意在突出各民主党派各显其能、发挥专长，辅助执政党不断提升抵御重大风险和应对重大挑战的执政能力；“好同事”旨在表明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参政党与执政党同向而行、同心同德，肩负着共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使命。

由此可见，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中，“三好”话语既是对各民主党派的政治角色定位，更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关新型党际关系的独特话语表达。协商、合作、参与是其话语特质，蕴藏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的基本精神，彰显的是合作、团结、和谐、民主的政治伦理和价值指向。它有效破解了西方把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执政”视为“一党专政”的话语陷阱和话语遮蔽。它反映的是战略性联盟、全时性竞合、建设性监督之新型党际关系^[3]。它形塑的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在历史发展中长期共存、在工作实践中互相监督、在政治道义中肝胆相照、在共创伟业中荣辱与共的政治新实践。它确证的是执政与参政、领导与合作、协商与监督有机统一的新的政治局面。

（三）话语功能定位：内蕴决策方式的“民主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集中各种意见和建

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4]。就此而言，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和制度实践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全面领导”等话语，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事无巨细、包揽一切，消弭或弱化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重要作用。相反，其话语的真实意涵则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做到统揽而不包揽、协调而不干涉，通过充分发挥多党合作、政党协商等民主形式与制度渠道作用，达到广泛汇聚力量、凝聚智慧、形成共识的效果，进而保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同时，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角色和身份，并不意味着其放弃了政治追求，丧失了政党政治功能^[5]，反而充分体现了制度决策方式的“民主性”。“民主性”的话语要求，意味着各民主党派需要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地进行参政议政，积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决策建言献策，及时发现、反馈政策与制度执行中可能或已经出现的问题、短板和弱项，为相关职能部门精准纠错纠偏，有效防范和避免发生重大决策失误，进而为推进、优化党和国家各项政策，有效制定、落实、执行各项制度，形成科学化民主化的政策与制度“制定、执行、反馈、优化、再实施”的运行闭环。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构的主要挑战

长期以来，西方垄断着政党政治国际话语权，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遮蔽^[6]。与此同时，与制度自身的实践效能相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话语体系、话语权建构方面，还有不少方面亟待充实完善。

（一）话语生成之维：制度理论研究与元话语供给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7]。这指的是要坚持文化自信，立足中国实际，建构听得懂、传得开、易理解、广认同的中国话语体系，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政党形象。客观而言，由于现代中

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不少地方是在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上开展的。所以,就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来说,西方政治学的概念体系、理论逻辑等,在实践与研究中被普遍使用。这就造成了中国在政治学元话语供给方面还存在不足,以至于有时我们不得不借用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政治实践。主观而言,由于深受西方政党政治理论的影响,一些学者在从事理论研究时,往往推崇甚至迷信西方的理论模型、研究方法、评判标准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政党政治理论研究以及学术话语、学科话语的“失语”和“他塑”状态,以至于我们较难将中国政党政治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丰富实践经验以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形态和理论形态呈现出来、传播出去。更有甚者,少部分学者以西方的话语标准、理论体系、分析模式来解释和解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形态、价值本质、实践经验与运行模式,这不仅不能取得良好的学术沟通、学术交流效果,还会掉入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话语霸权的陷阱当中。

由于中西方的历史文化底蕴、政党政治实践探索道路、政党制度的孕育生长轨迹存在差异,如果按照西方的政党政治理论以及话语体系、话语标准来解释和认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那么丑化、矮化执政党形象、参政党形象等必然存在于其话语表达和传播之中。实际上,无论何种政党制度,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历史、理论和实践基础之上,凭空而来的政党制度是不存在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两个结合”视域下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一种独特的政党制度类型^[8]。只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针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提炼中国特色新概念、新范畴、新理论等元话语的供给上还有不足,还未能形成与西方主流政党理论进行平等交流和有效对话的话语体系与话语权。因此,建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亟须破解许多理论堵点、学术难点,需要提炼富有中国特色和一般意义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规范、

新表达,不断提升制度话语供给力。

(二) 话语创造之维:议题设置与话语说服力不强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硬实力,在国际话语议题设置上塑造软实力。话语议题设置和话语说服力与国家硬实力是正向相关关系。西方凭借强大的话语霸权、话语权威,特别是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着强大的话语引导、话语影响和话语说服力,使得国际话语议题设置呈现“西强东弱”的状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议题设置和话语说服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而不断增强,但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对全球治理的贡献还不相匹配。

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经济上,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和最大的贸易国;科技上,中国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量子通信、5G技术、高铁交通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文化上,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内含丰富的优秀文化资源和积极的文明因素。但是,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并未能及时转化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议题设置优势和话语说服力,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建构和国际话语传播方面仍然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未能彻底改变以西方叙事遮蔽中国叙事的被动状况。

(三) 话语传播之维:话语引导与传播工作不力

有学者认为,必须从中国的内部和发展出发去理解、认识中国^[9]。这启发我们,建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在不断丰富话语内容和话语表达的同时,还要加强话语传播工作,探索行之有效的话语传播手段,建构多元话语传播平台,畅通多种话语传播渠道,提升话语传播能力,增强话语体系传播效能。但就目前话语引导和话语播现状来看,话语体系建设

还存在进一步提升空间。

一是对内话语传播手段较为单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内的话语表达政治性和学术性较强,传播手段灵活性不足,且以自上而下的灌输说教和政治宣传手段为主,话语引导和传播不接地气,以至于在对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内容的理解上容易产生梗阻问题,这就在无形当中产生了普通群众对新型政党制度了解不够、理解不深的问题。2023年上半年,辽宁省级、市级层面开展的一项专项调研显示,60%以上的民主党派成员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不太熟悉^[10]。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对内讲深、讲透、讲活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和意义,加大宣传力度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是对外缺少行之有效的融合传播平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对外话语传播中缺乏有效的融合传播平台,以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很难进入西方主导的政党理论和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中。其带来的最为直接的影响便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认知度、认同度偏低。在传播渠道上,对外宣传渠道、手段较为单一,以官方对外传播为主,民间传播渠道开发较少,很少有人自觉主动宣传、推介、讲解、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及其理论,这与中国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不匹配。在传播语言上,我们通常高度重视英语、法语、日语、俄语、德语等语种,对其他语种特别是一些小语种往往重视不够。在传播媒介上,未能做到利用新兴载体,灵活多变地宣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构的优化路径

优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路径主要是,通过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不断强化,增强对外政治宣介、政治沟通和学术交流对话中的主动权,积极回应和驳斥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偏见与误解,不断为扩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世界影响力和认同度服务。

(一)加强元话语供给:深化理论研究和“两个结合”

一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构系统完善的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需要立足中国实际,充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成效相结合,在制度实践创新的基础上加强制度基础理论研究和创新,加强制度的元话语供给。这套理论体系既要科学系统地阐释和解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要义、内容边界、独特优势、鲜明特色、世界意义、重要贡献、发展方向等,又能不断提升制度影响力与广泛认同度。其关键在于,要真正讲清楚制度背后蕴藏的道理、学理和哲理,建构既有世界意义又具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最终实现以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指导实践的前瞻性增强制度的吸引力、说服力、引导力^[11]。

二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表达体系。制度认同、话语认同从根本上说就是文化认同。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党制度。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政治和社会制度选择也会迥然不同。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基因而言,首先是我们“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12],其次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中不断创造的以民主、团结、合作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文化。这两大文化不仅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运行中不断丰富其理论内涵,而且也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导向,更是评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劣的重要依据。因此,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在积极学习借鉴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成果的基础上,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丰富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资源^[13],全面系统阐释、宣介和推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而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要求、具有世界意义,讲得通、好理解、易接受、广认同的话语表

达体系。

（二）增强话语说服力：加强话语创造和议题设置

制度优势和制度治理效能是进行话语创造的源泉和强大底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和突出的制度治理效能。“领导”“合作”“执政”“参政”“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等话语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内涵，也是区分中西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重要标识。目前，这些话语得到了国外一些政党、政要、学者和观察家的认可。但是，从整体来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的影响力、说服力在世界范围内还相当有限。因此，我们要在既有话语体系和制度优势、制度治理效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制度话语创造，丰富制度话语内容，完善制度话语体系，科学系统地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多党合作、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重要作用，更好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说服力、影响力和认同度。

好的话语议题必定是以我为主、内容重要、普遍关切、广泛认同且对自身又十分有利的议题。因此，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议题设置上，我们要逐步变“他塑”为“自塑”，积极主动设置有利于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话语议题。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角色定位、有什么样的功能作用，要担当什么样的历史责任，一党长期执政为什么不是“一党制”下的“一党专政”，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为什么不是“花瓶”或“摆设”，等等，这些不仅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议题，也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议题，还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关注的焦点问题。要主动探究这些议题，以自信的姿态积极回应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质疑与误解。这不仅有利于国际社会全面了解中国，而且有助于不断增强其他国家对中国认同感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引领力。具体而言，就是

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全面、准确、系统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主要内容、历史进路、运行机制、功能作用、特色优势以及现实地位等。

（三）贴近话语受众对象：加强话语传播和话语引导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交织、多元文明共存的世界，多元文化孕育滋养了多元文明形态和多元话语认同。因此，建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要结合多元文明共存实际和多元文化传统，摒弃西方极力倡导的“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式的话语建构。通过加强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建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标识，全面激发国外人士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关注点，不断增强他们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认同，进而持续扩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世界影响力。同时，还要结合数字化时代特征，不断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传播和话语阐释的针对性、时效性和灵活性，丰富传统媒体话语传播渠道，充分利用新型数字化传播平台与技术，加强融合媒体传播力度，综合、立体、快捷、精准、高效地向外部世界传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优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加强话语传播效能，要使话语契合不同地域的多元文化传统、把握不同的文明特点特色，贴近话语受众，做到有的放矢。如果不考虑或不了解国外受众的价值取向、阅历经历、身份职业、知识结构、生长环境等，只是按照中国表达方式和言语习惯，那就会不利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传播。简言之，建构和传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加强话语引导，应遵循“贴近实际、贴近受众、精准投送、融合传播”的十六字要义，做好转换。要由政治性叙事转换成知识普及性叙事，由先进事迹性叙事转换成个人励志性叙事，由政治宣传性话语转换成专业传播性话语，由说理性话语转换成故事性话语，最终达到共识性传播和共情性传播效果^[4]。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8.
- [2][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293、346.
- [3] 臧秀玲, 康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党关系模式的鲜明特性与文明价值 [J]. 理论视野, 2023(5): 82.
- [4][12]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 [N]. 人民日报, 2018-03-05(1)、(1).
- [5] 张献生.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政治文明新形态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 76.
- [6] 臧秀玲, 贾晓强.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核心要素、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4): 18.
- [8] 梁晓宇.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伟大政治创造研究——基于政党制度类型比较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3): 4.
- [9] 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上卷 [M]. 谢亮生, 杨品泉, 黄沫, 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13.
- [10] 周婧. 突破、超越、重塑: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研究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6): 43.
- [11] 黄天柱. 加快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 [J]. 团结, 2024(1): 47.
- [13] 徐晓霞. 创新中国话语体系 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传播作品为例 [J]. 新闻传播学刊, 2024(1): 60.
- [14] 李宇. 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需要推进三个关键转换 [J]. 对外传播, 2023(4): 50.

责任编辑: 王天海

人民政协成立以来的发展逻辑及经验启示

金建明

摘要:人民政协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自成立以来,人民政协性质定位与时俱进、主要职能延伸拓展、界别组成不断扩大、组织结构逐步完善、履职方式日益丰富、工作制度更加健全,正在朝着更加成熟定型的方向发展。新时代新征程上,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发扬民主与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关键词:人民政协;发展逻辑;经验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协始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回顾人民政协走过的光辉历程,深刻理解人民政协的发展逻辑,准确把握人民政协工作的规律,对于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一步实践好人民政协理论、坚持好人民政协制度、发展好人民政协事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心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民政协的发展逻辑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自 1949 年 9 月成立以来,人民政协经历了创立探索、巩固完善和更加成熟定型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自身的发展逻辑,不断展现出旺盛生命力。

(一) 性质定位与时俱进

性质定位是人民政协工作的基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以下简称“政协章程”)规定,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

收稿日期:2024-11-28

作者简介:金建明,江苏省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研究方向为政协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协制度研究”(22FDJB004)、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中国统一战线学科建设路径研究”(ZK0120240107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2]。这六句话是一个有机整体,解决的是人民政协是什么的问题。前三句话讲的是人民政协的性质,其中,第一句话规定了人民政协的根本属性,第二、三句话规定了人民政协的基本属性;后三句话是对人民政协定位的表述,分别界定了政协协商在协商民主体系中的独特位置和基础作用,阐明了人民政协同国家治理的内在联系,明确了人民政协制度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方面。

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发展的,有一个认识不断深化、表述逐渐完善的过程。人民政协从一开始就是作为统一战线组织而产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人民政协“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3]。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共662人,几乎包括了所有主张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党派团体代表,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以及宗教界的代表,具有广泛代表性。其中,中共党员约占44%、各民主党派成员约占30%,无党派人士约占26%。毛泽东在看到代表名单时说,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天书”。此后,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这一性质的规定,在历次政协章程制定和修订中都没有改变。人民政协作为多党合作组织的性质,在其成立之初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但是客观存在的。从一开始,人民政协就是各党派团结合作、参政议政、共商国是的重要场所。毛泽东指出,人民政协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李维汉将人民政协称为“统一战线总部”,并提出“对政协这样了解,则人民政协的工作范围就很广了,比政治协商宽多了”。由此可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民政协的性质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即人民政协是政治协商机关。但很长一段时期内,政协章程都没有明确规定这一性质,直到1994年修订政协章程时,才明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作为人民政协的性质

写入政协章程。人民政协与民主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人民政协成立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就多次强调人民政协在协商、建议及扩大民主方面的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意识到民主法制的重要性,通过发挥人民政协作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1995年,中共中央在转发《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的通知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多党合作的机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2004年修订的政协章程,对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用上述三句话进一步规范表述。进入新时代,人民政协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日益彰显。因此,2018年修订的政协章程明确,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4]。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为此,2023年修订的政协章程明确提出,人民政协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从而进一步深化、拓展和充实了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的内涵,提升了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为人民政协更好履职尽责拓展了舞台、指明了方向。

(二) 主要职能延伸拓展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这既是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人民政协理论创新的成果。履行这三项主要职能,体现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和特点。

政治协商是人民政协的首要职能,开展政治协商是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的内在要求。人民政协成立之初,其主要任务就是同政府协议事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政协仍然承担政治协商的职能。在人民政协以后的各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政治协商的职能得到不断完善和规范。

民主监督职能起源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

士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互相监督,以及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对党和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建议的履职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党内不重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及民主党派提出“光荣解散”等错误观点,毛泽东、周恩来和李维汉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批评,并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改革开放后,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逐步得到明确。1980年9月,邓小平不仅指出人民政协是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而且进一步提出“应当很好地总结经验,使实践中证明是有益的东西,在修改后的章程中得到反映”^[5]。根据邓小平这一指示,1982年的政协章程明确指出,人民政协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建议和批评”^[6]。虽然彼时没有明确提出“政协主要职能”这一概念,但人民政协民主监督作用的实现途径已经明确。1994年3月,民主监督作为人民政协主要职能之一,在修订政协章程时得以明确。

参政议政首先由基层政协提出并探索实践,以后逐渐得到中央和国家层面的认同和倡导。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共中央的重视和全国政协的支持下,基层政协积极开展工作,帮助基层党委政府处理地方重大事务。例如,1958年11月8日至23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及政协山东省委员会在济南联合召开县政协工作现场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化以后县政协的设立和县政协的工作问题^[7]。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协参政议政的职权进一步明确。在1982年的政协章程中,参与对国家和地方事务重要问题的讨论是各级地方委员会的职权之一^[8]。这一章程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参政议政”的概念,但是已经将其作为人民政协的经常性工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参政议政”的概念首次被提出,其内涵也不断丰富。1994年3月,在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参政议政被进一步提升为人民政协职能加以认识。会议提出,视察、考察、调查研究和提出建议案、提案等各种活动,

都是以各种形式进行参政议政。2004年修订的政协章程,把参政议政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并列在一起进行表述。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凝聚共识是人民政协自成立以来一以贯之的任务,是人民政协性质定位赋予的重要职责,也是人民政协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迫切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协在调整关系、加强团结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有效调动了各界人士为推进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中共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成为汇聚民族复兴正能量的重要阵地。一方面,中共中央对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9]。另一方面,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中共中央的新部署,凝聚共识成为人民政协履行三大职能的关键指向,为人民政协继续完善自身职能明确方向。2023年修订的政协章程,在规定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后,增加了“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10]的相关表述。

三项职能相辅相成,都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于工作实践中,共同助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三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政治协商重在协商议事、资政建言,民主监督重在发现问题、推动落实,参政议政重在反映民意、汇聚智慧。凝聚共识不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简单的延伸和拓展,而是人民政协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

(三) 界别组成不断扩大

在我国政治体制中,人民政协是唯一由界别组成的政治组织。人民政协的界别大体分为党派团体界别、无党派人士界别、专业界别和特邀人士界别四大类。

人民政协的界别设置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需

要、社会状况及统一战线的变化而发展的。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既有党派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有区域和军队等代表,还有特别邀请人士。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参加人民政协的单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届全国政协仅有包括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在内的28个参加单位,地区和军队两类共15个单位不再作为参加单位。此后,各届全国政协界别设置略有变化,有的取消,有的新增,有的合并调整。三届全国政协将自然科学团体改为科协;五届全国政协界别29个,取消合作社、增设体育界,同时将文联、科协、社会科学团体分别改为文学艺术界、科技界、社会科学界;六届全国政协界别31个,将农民界改为农林界,同时增设“港澳同胞”和“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两个界别;七届全国政协届中恢复科协界,将华侨界改为侨联界,共32个界别;八届全国政协增设经济界,并将“港澳同胞”分为独立的两个界别,界别增至34个;九届全国政协仍保持34个界别,只是将其中的一些界别名称作了调整;十届全国政协将社会福利界又改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十一届全国政协将无党派民主人士改为无党派人士;十四届全国政协再次对界别设置进行调整,增设“环境资源界”,同时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合并,十四届全国政协目前共设34个界别。

人民政协基础在界别,特色在界别,优势也在界别。自成立以来,人民政协通过界别调研、界别协商、界别提案、界别大会发言、界别社情民意信息等,积极反映各界群众愿望与要求,激发界别履职活力,充分彰显了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四) 组织结构逐步完善

人民政协设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全国委员会对地方委员会的关系和地方委员会对下级地方委员会的关系是指导关系。就人民政协自身的组织结构而言,因一届全国政协承担协商建国

的任务,人民政协分为全体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三层;从二届全国政协起,人民政协各级委员会只分为委员会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两层。这样做,不仅是因为全国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结束,还有利于扩大人民政协的团结面、保持广泛的代表性。

专门委员会在政协常委会和主席会议领导下开展工作,在落实人民政协职能和组织服务政协委员履职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其前身是工作组。一届全国政协设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国防、民族事务、华侨事务、宗教事务8个组^[11]。以后工作组有所增加,到1983年发展到15个。与此同时,全国政协又相继成立了一些专门委员会,例如,1955年成立学习委员会、1959年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年改称为文史资料委员会)、1983年成立提案工作委员会(1988年改称为提案委员会)。1988年,全国政协改变“委组并存”格局,在原来委员会、工作组的基础上组建了14个专门委员会。此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全国政协多次调整专门委员会设置,最近的一次调整是2018年增设农业和农村委员会。目前,全国政协共设提案委员会等10个专门委员会。

地方政协是人民政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民政协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50年,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地方委员会的决定》规定,在普选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所产生的省、市协商委员会代行政协地方委员会的职权^[12]。1954年的政协章程对县设立人民政协没有提出明确要求。1978年的政协章程仅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政协组织,其他地方只是根据需要设政协组织。改革开放后,为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统战工作需要,1982年的政协章程才规定,凡有条件的县(市、区)都可设立地方委员会。截至2020年底,全国市县政协组织共有3168个,其中市级人民政协413个、

县级人民政协 2755 个,委员总数 65 万左右。全国已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四级组织体系,各级政协组织上下联动、左右互动,相互配合、密切合作,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织资源。

(五) 履职方式日益丰富

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方式主要包括会议和经常性工作。在人民政协全部活动和工作中,会议最为常见,也十分重要,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发挥作用,以及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基本形式。经常性工作是指在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闭会期间,按照政协章程有关规定,组织政协委员开展的各项工作和活动,主要有提案、学习、团结联谊、协商议政、委员视察、调查研究、对外交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大会发言等。自成立以来,人民政协履职方式不断丰富发展,逐步形成了政治协商深入、民主监督有效、参政议政扎实、委员作用发挥充分的生动局面。在众多的履职方式中,全体会议、常委会会议等一以贯之并不断规范完善,双周协商座谈会等在实践中探索发展并被赋予新的内涵,网络议政、远程协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不断探索创新。

双周座谈会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由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起设立,当时主要是为了交换思想看法。在中断了近半个世纪后,十二届全国政协继承优良传统,创新设立双周协商座谈会,邀请政协委员和党政部门负责同志定期交流座谈。十三届全国政协持续改进会议组织方式,强化互动交流,并以政协信息形式报送会议主要成果。当前,双周协商座谈会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解决大问题,已经成为全国政协履职的一个靓丽品牌,成为人民政协在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生动实践。

开展网络议政、远程协商是十三届全国政协顺应信息化发展大势,把互联网优势与人民政协协商特色有机融合,创新委员履职方式的有益探索。这进一步丰富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形式,

打破了委员履职的时空限制,以线上线下的同步讨论实现了“天涯若比邻”的效果,有效解决“年委员”“季常委”等长期困扰人民政协工作的难题,让委员思想永远在线、智慧时刻连线、联系永不断线。例如,十三届全国政协先后开设主题议政群 144 个,发言数量达 9.1 万余人次,网上提案提交率达 92.17%,委员议政建言的总量相当于增开了一次全体会议。

(六) 工作制度更加健全

健全的制度体系是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必然要求。经过多年的发展,人民政协已形成了以宪法、中共中央文件为统领,以政协章程为依据,以人民政协自身工作制度为基础的一整套规章制度,人民政协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不断成熟定型。

一是宪法规定。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13],并提出这一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1993 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又充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14]。人民政协的性质作用载入宪法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为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是党的政策文件。自人民政协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围绕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等,分别就加强和改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人民政协协商民主、人民政协民主监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市县政协工作等出台制度规定,为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及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

三是政协章程。人民政协诞生以来,先后在 1954 年、1978 年、1982 年颁布了三部政协章程。现行的政协章程,是在 1982 年章程的基础上,经过 1993 年、1994 年、2000 年、2004 年、2018 年、2023 年 6 次修改而成,由总纲和工作总则、组织

总则、委员、全国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会徽六章组成,共63条,总体上适应了新形势新任务对人民政协工作的新要求。

四是人民政协自身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涉及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履行三项职能、组织服务管理、机关内部运行等方方面面。历届全国政协都十分重视人民政协制度建设,一方面修订既有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根据新形势新情况制定出台新的制度规定,并认真抓好制度的贯彻执行。截至2024年8月底,十四届全国政协已经制定和修订118项制度,推动人民政协履职更加有章可循、有制可依、有规可守。

二、人民政协发展的经验启示

人民政协的发展逻辑,都是围绕着人民政协对初心和使命的坚守而展开的。人民政协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团结和民主,服务工作大局,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显著政治优势,是科学、有效、管用的制度安排,在人类政治制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政治价值”^[15]。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以贯之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要求、组织要求,也是人民政协的政治灵魂。人民政协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的,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的。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深刻把握人民政协制度和人民政协组织的鲜明政治属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人民政协工作的总纲,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动人民政协党建“两个全覆盖”有效落实,坚定不移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人民政协全部工作之中,始终坚定人民政协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

(二) 紧扣党和政府中心任务履职一以贯之

坚持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谋划和开展工作、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原则。自成立以来,人民政协在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时

代新征程上,要把服务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为工作主线,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建设文化强国、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发展与安全等方面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深入调研,充分协商,强化监督,助推落实,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三) 突出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一以贯之

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两大主题。自成立以来,人民政协始终坚持在加强团结的基础上发扬民主,通过发扬民主实现广泛团结,展现出了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突出团结和民主,在建言资政中广泛凝聚共识,在凝聚共识中更好建言资政,切实担负起“落实下去、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广泛汇聚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四) 在履职中坚持协商民主一以贯之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伴随着人民政协的产生而形成的,是在人民政协协商实践中得以充分体现的。人民政协是我国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具有强大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人才优势。自成立以来,人民政协聚焦协商主责主业,积极担当作为,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健全协商民主机制的部署安排,坚持完善协商内容与丰富协商形式有机结合,把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统筹推进,完善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机制,加强人民政协协商同其他协商形式的协同配合,健全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完善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机制,着力培育平等、有序、真诚的协商民主文化,不断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

(五)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一以贯之

人民政协为人民。自成立以来,人民政协坚持把履职为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紧扣民生领域实际问题调研议政，积极反映群众愿望和要求，协助党和政府增进百姓福祉。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着力加强人民政协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的制度机制建设，聚焦民之关切协商议政，深入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和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多做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的工作，当好思想政治引领者、政策落实推动者、民情民意代言者、矛盾纠纷化解者、民生民利维护者。

（六）注重发挥委员主体作用一以贯之

政协委员是人民政协制度的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人民政协工作优势在委员、活力在委员、潜力也在委员。自人民政协成立以来，一届又一届政协委员胸怀大局、接续奋斗，致力发展、奉献社会，为人民政协事业增光添彩。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政协委员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协委员提出的各项要求，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提高政治能力，秉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自觉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以模范行动展现政协委员的时代风采。

参考文献：

- [1][15]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4-09-21(2)、(2).
- [2][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N]. 人民日报, 2023-03-19(3)、(3).
- [3][11][12]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 [G].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80、97、126.
-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 [N]. 人民日报, 2018-03-28(1).
- [5] 邓小平年谱: 第四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677.
- [6][13][14]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 [G].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407-408、378、531.
- [7][8] 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 [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21: 393、460.
- [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07.

责任编辑: 王天海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世界政治文明的原创性贡献

李玫萱

摘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明的一种代表性制度形式,对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建立合作型政治关系拓展了新的政党关系模式,通过创新执掌政权方式代表了新的执政参政方式,通过将选举和协商相结合创造了新的民主实现形式,通过治理国家的高效性体现了新的国家治理范式。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将有助于开拓世界政治文明的新视角、充实世界政治文明的新内容、构建世界政治文明的新模式。

关键词:政党政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世界政治文明;制度优势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运行的主要模式,政党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是重要的政治组织。因而,政党制度作为政治体系的核心,直接影响政治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水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1],它既不同于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也不同于一党专政的政党制度,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结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有特殊性、也包含普遍性,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大花园中别具风采的中国花朵,也是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2]。

一、文献综述

应建立何种形式的民主政治、应选择怎样的政治文明发展路径,至今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观点。

探讨这些问题,首先需界定政治文明的概念。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马克思引入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并将其与集权制度置于对立面,强调政治文明的核心在于民主制度的发展^[3]。关于政治文明的定义,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观点。《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政治文明作了界定:政治文明指的是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政治成果的总和。它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其中,国家的政治制度被视为政治文明核心^[4]。王惠岩在《政治学原理》中也对政治文明作了界定,他认为,政治文明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人们为了构建公共秩序和促进社会发展而形成的一系列价值标准、

收稿日期:2024-11-03

作者简介:李玫萱,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研究”(23ZJD0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组织结构及制度设计的综合体系,主要涵盖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三个领域,其中,政治制度处于中心地位,起着关键作用^[5]。杨海蛟在《政治文明:理论与实践的思考》一书中认为,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体现了人类自从迈入文明社会后,在社会改革和自我提升的过程中所创造并累积的正面政治成就,以及与社会生产力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政治进步状况^[6]。虞崇胜在《政治文明论》中指出,政治文明是由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三方面构成的有机整体,并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其进行了阐释。从静态视角观察,它涵盖了人类在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所有进步成就;从动态视角观察,它体现了人类社会政治演变的历史过程^[7]。综上所述,政治文明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政治发展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两个层面的内容,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一个社会、国家的文明水平。具体而言,政治文明包括完善的政治制度、广泛的政治参与、有效的治理模式以及和谐的政治氛围。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明的一种代表性制度,对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独特贡献。当前,学界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世界政治文明作出的贡献开展了广泛研究。臧秀玲、康乐从政党关系的视角考察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于规范政府运作模式、创新民主实施方式以及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贡献^[8]。谢小飞、宋伟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塑造了“天下为公”的政党精神风貌,在组织模式上超越了竞争性的政党体制,有效推动了民主进程与国家治理的和谐共进^[9]。秦佳宇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文明上的贡献体现在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增添了新的内涵,为全球寻找更优的政党制度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并为挑战西方政党政治的话语主导权提供了坚实的支持^[10]。耿百峰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构建了一种蕴含中国智慧的执政模式,形成了多党合作的结构,并建立了多层次协商的运行机制^[11]。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基于政治文明的层面从政党关系模式、执政参政模式、民主实现形式、国家治理范式的角度探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于世界政治文明的价值贡献。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新的政党关系模式

目前,在全球逾 200 个国家与地区里,绝大部分国家与地区都推行政党政治。鉴于国情与政治文化的差异,各国孕育出了多样化的政党关系模式。学者们从属性、效用及组织形态的角度对政党关系模式展开了多维度的分类研究。法国学者迪韦尔热对政党制度的分类贡献显著,他从数量上将政党关系模式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在西方语境中,政党关系模式的划分通常反映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段性特征^[12],与西方政党关系模式所表现出的疲惫衰败之态相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一党制。一党制是在特定政治环境下形成的,其核心特征是独裁专制,没有合法存在的其他政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一党制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能够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不仅在协商会议中发表意见,还在立法、决策等过程中提供建议。相比之下,一党制往往表现为高度集中化的权力结构,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社会各界的参与度较低。一党制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反馈机制,因而常常导致权力的滥用与腐败现象的滋生。另一方面,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强烈的民生导向。党委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往往会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联系人员广泛的优势,基于对民众需求的调研与分析,力求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关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与专制政党在政策制定上往往只考量一党私利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两党制、多党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与多党制是资本主义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二者虽各具特点，但本质特征相同，即政党为获取执政权力而激烈竞争，所以被称作“竞争性的政党关系模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两党制和多党制有着显著区别。一方面，两者有组织结构的差异。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中，政党之间的竞争往往是激烈且对立的，这种竞争时常会导致政治极化，使得社会分裂更加明显，政策制定变得缓慢且受制于短期利益。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其他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能，形成了合作共治的局面，这强调的是社会各阶层共同利益的整合，旨在通过协商与合作实现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决策机制的差异也值得关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党在选举后的执政过程中会面临相互制约与博弈的局面，这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权力的制衡。然而，频繁的政党轮替和政策不连贯也可能导致治理效能降低。相对而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通过集中力量解决国家重大问题，使得党委政府在应对经济波动、公共卫生危机等方面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呈现出包容合作的政党关系模式打破了西方政党关系模式的固有框架，极大增强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对于重构和优化世界政党的关系模式，拓宽世界政党理论研究广度与深度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代表了新的执政参政方式

政党作为政治组织，旨在通过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来实践其政治纲领。政党制度即国家法律界定或实际政局构成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尤指政党执掌、参与或影响国家政权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13]。在不同的政党制度中，执掌政权和参与政权的方式，映射出政党与国家权力机构间的独特关系。这些不同的关系，展现出政党在国家治

理中扮演角色的多样性。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内，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领导党，属于“统领型政党”^[14]，承担着领导国家和社会前进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领导地位，是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代表人民执掌政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深层次地体现在国家发展方向的确立、重大决策的制定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引领等方面。中国共产党依法向国家政权机关举荐领导干部，使其担任政府与司法监察机关的领导职务；经由法定程序，将有关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政治主张、大政方针、战略部署转化为国家意志，借助国家政权推动并施行。这种领导方式体现了中国政治体系中的一种高度整合性，即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来实现国家治理的连贯性和高效性。这与其他国家中的执政党有着显著差异。其他国家的执政党主要是通过竞选上台，更多地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在竞选过程中，政党为了赢得选票，可能会过度迎合部分选民的短期利益诉求，而忽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长远发展的需求。同时，由于政党轮替频繁，政策缺乏连贯性，执政党难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进行规划和决策。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这一角色与其他国家中的在野党有着本质的区别。“参政党”这一概念是对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里的地位与作用的界定，也是民主党派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政党的特性。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15]。首先，从职能来看，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决策过程。党派成员通过多种途径，就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提案。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民主党派在教育、科技、文化

等诸多领域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在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规划过程中,有党派身份的专家学者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为项目的可行性、科学性提供智力支持。其他国家的在野党往往扮演反对者的角色,更多地关注如何批评执政党的政策以获取政治资本,在实际的国家治理参与方面相对有限。其次,在政党关系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的是多党合作。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是亲密友党关系,他们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这种合作关系体现为各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之相反,其他国家的政党之间多为竞争关系,在野党与执政党常常处于对立、对抗的态势,为了争夺政权而进行激烈的斗争,政党之间的固有矛盾往往会影响到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最后,从政党的发展目标来看,中国民主党派的**政治目标是为了推动整个国家的全面发展。党派成员积极参与脱贫攻坚事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贡献力量。而其他国家的在野党往往从自身党派利益出发,为了在下一次选举中获胜而调整策略,其关注焦点更多地集中在如何获取选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所形成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党关系展示了多元参与下的和谐稳定,为各国提供了一个以共识而非冲突为基础的政治协作模式。在全球多极化趋势下,这一模式证明了不同政治力量可以通过合作协商达成共识,共同推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新的民主实现形式

政党制度是民主政治的成果,构成了现代社会民主政体的关键组成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选举民主是一种建立在代议制基础上,以选举为核心机制的政治民主形式,其强调通过定期选举来选择政治代表,民众的政治参与及民主实践体现在定期举行选举投票。选举结束后,政治系统的运转则由执政党或政党联盟掌舵。“人民只有投

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16]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仅强调投票选举这种民主形式,既难以代表民众的意愿,也不能实现民众管理国家的权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17]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18],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19]。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民主形态,它并非西方选举民主的简单复制,也不是西方政治学者所探讨的协商民主模式,而是将选举机制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有机融合起来,构建了全方位覆盖民主进程各环节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中,协商民主展现出其独有的全民参与性、议题多元性、程序包容性、决策实效性以及成果共惠性。协商民主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支撑并促进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与成熟。

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充分体现了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一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充分体现了民主的广泛性。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除中国共产党外,还有其他民主党派参与政治生活。中国的民主党派并非是象征性的存在,它们在政治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各民主党派都有机会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组织或平台,提出意见建议,参与国家治理,积极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保障了各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还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提供了意见和利益有效表达的制度渠道,从而实现了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参与。二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了民主的真实性。所谓“真实的民主”,并不仅仅指形式上的选举和表面的政治参与,而是在具体政策决策、社会治理及人民利益保障等方面,形成了实质性的互动与反馈。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通过协商机制,开展广泛的对话与合作。这种合作方式避免了恶性竞争,强调共同的社会责任与发展目标,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且政策落实过程中也能迅速回应民众需求和社会变化。

另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加强民主监督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一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相结合的制度设计,强化了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在党内,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民主机制,确保党的决策和执行透明公开,及时纠正偏差。在党外,各民主党派不仅参与政治协商,而且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平台,发挥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作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系内有重要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可以通过议政建言、批评建议等方式,促进政策的公开与透明,进而推动党委政府自我完善和自我纠错。二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对政府决策的监督。来自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协委员,能够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展广泛的讨论和协商,提出建议、批评,进行监督。概言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蕴一种独特的政党互动关系,展现了一种深度融合、全面协商的民主样式,推动了各民主环节之间的互动共进,形成了科学完整、有效衔接的民主运行程序,实现了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机衔接,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强大活力,也为解决西式民主所造成的民主危机和政党衰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昭示了新的国家治理范式

某种意义上,政党在执政期间实际上就是在进行国家治理。政党制度是国家治理架构中的关键支撑,这体现在培育国家治理的价值观、界定治理主体的职责、构筑国家治理实践平台以及革新治理手段等方面。因此,不同的政党制度呈现出差异化的治理模式、施政方法及治理成效。

“大国需要大党,大党引领大国治理。”^[20]

当前,西方社会面临的动荡局势,源于缺乏强有力的政党主导国家治理。是否为强大政党主导下的国家治理,构成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范式的显著差异。中国国家治理的高效性,只有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落地生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助推了国家治理的高效运行,不仅保障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还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供了参与国家治理的平台,增强了政治的包容性和代表性,是一种“‘领导’与‘合作’的非零和博弈关系”^[21]。

首先,政党关系和谐奠定治理基础。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亲密友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种领导不是简单的强制命令,而是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广泛凝聚共识。例如,在制定国家发展规划时,中国共产党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意见,各民主党派基于自身的界别特色和专业优势,提出众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这种和谐的政党关系,使得各方力量能够迅速整合到国家治理的大目标下,为高效治理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广泛代表性确保治理的全面性。各民主党派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群体和界别。这种广泛的代表性使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反映到国家治理决策中来,这就确保了国家治理能够全面回应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从而提高治理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再次,政治协商提升治理决策质量。政治协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与民主党派进行广泛的政治协商。在协商过程中,各方充分表达意见,求同存异。这种协商贯穿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在决策之前,通过座谈会、协商会等形式,各民主党派可以对重大决策进行充分论证。例如,在三峡工程建设决策过程中,民主党派中的水利专家、环境专家等参与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从不同角度

提出专业意见,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在决策实施过程中,民主党派可以通过民主监督等方式,及时发现并反馈问题,促使决策不断调整优化,保障决策能够高效执行,从而提升国家治理的水平。

最后,凝聚共识提升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确保了国家治理有明确的方向,而各民主党派通过多种形式,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向所联系的群体进行宣传。这有助于将分散的社会力量凝聚成推动国家治理的强大合力,从而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力,提高了治理效能。总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昭示的国家治理范式、展现的治理成效,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这一模式的成功实践不仅为提升当代世界民主政体的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也为全球政治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 [1][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0、16.
- [2] 张献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政治文明新形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213.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38.
- [4][13]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504-505、477.
- [5] 王惠岩.政治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31.
- [6] 杨海蛟.政治文明:理论与实践的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0.
- [7] 虞崇胜.政治文明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123.
- [8] 臧秀玲,康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党关系模式的鲜明特性与文明价值[J].理论视野,2023(5):82.
- [9] 谢小飞,宋伟.塑造民主与治理复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贡献[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3(2):48.
- [10] 秦佳宇.政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1):24.
- [11] 耿百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人类政党政治文明新形态[J].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3):9.
- [12] 臧秀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基于政党的类型学分析[J].当代世界,2022(7):23-24.
- [14] 卢鹏,臧秀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契合互动[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3):15.
- [16][17][1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89、25、27.
- [19] 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36.
- [20] 陈文新,杜晓鹤.党的政治领导力赋能国家治理的逻辑路径[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2.
- [21] 贾德忠,孙润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及其实践——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多维度比较[J].学习与探索,2024(3):4.

责任编辑:王天海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伟大的政治创造

——基于政党关系维度

梁晓宇 李文迪

摘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多党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以一种崭新的政党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创造性。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平等地位受宪法保障并在实践中得以落实,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制度机制,鼓励支持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通力合作。这种以平等、合作、协商为基调的政党关系,跳出了西方政党政治的框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格局,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

关键词:政党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民主党派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关系,不同于一党制中的独裁专制,区别于多党制下的竞争制约,也非既联合又竞争的混合体。确切地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具有平等地位的亲密友党,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与中共在合作中携手同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要“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1]。中国共产党支持民主党派搞好自身建设,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目标一致,戮力同心,同向同

行,创造了崭新的政党关系。

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位平等

平等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并肩共进的辉煌历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平等地位是法律平等与事实平等的统一,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得以充分彰显。

(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平等地位受宪法保障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位平等的最高法律保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收稿日期:2024-09-17

作者简介:梁晓宇,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湖南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统一战线理论;李文迪,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23BKS0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2],这就明确了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的法律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过程亦是对平等的诠释,仅在筹备会中,来自不同单位的 600 多位代表进行了 7 次分组讨论,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协商拟定。民主建国会代表章乃器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胡乔木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大智大勇,虚怀大度,“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平等协商国家大事”^[3]。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平等地位,自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起就受到最高法律效力的保障,并不断巩固。1954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序言明确指出,“这个宪法以 1949 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肯定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巨大作用与价值。并且,“民主党派”一词首次在宪法中出现。1982 年的宪法重新明确了统一战线的含义,强调“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1993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序言,平等的党际关系再次得到巩固,中国政党制度上升为一项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政治制度。

(二)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平等地位是实质性平等

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共性是都存在在野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的政党关系与它们存在本质差异。

首先,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有着共同的政治追求,即共同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是出于赢得选举票数或短期的政治利益。其次,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亲密友党关系经历了重重考验,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地位在历史的检验中得到确立与巩固,民主党派在大团结、大联合的旗帜下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成为参政党。因此,从本质上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参政党有别于西方政党制度下的在野党、反对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基于共同信念、共同价值的亲密友党。

(三)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平等地位在实践中彰显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4]人类的认识是通过人与世界的实践活动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来源,也是检验认识的标准。新中国成立后,从 1950 年至 1953 年初,各民主党派成员总数从 1.1 万余人发展到 3.2 万余人。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各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发生了巨大转变,从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转变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出现了认为“民主党派是包袱”,不过是“一根头发的功劳”的错误思想。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5]这纠正了党内部分同志的错误思想,提高了全党对统一战线的认识,也鼓舞了各民主党派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决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多党合作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团结协作、合作共赢的平等关系体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例如,各民主党派通过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反映社情民意,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制定法律、监督政府,在行使人大代表各项权利的同时,也履行了参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参政议政的重要职能。

二、中国共产党支持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不断完善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制度体系,引导各民主党派有序政治参

与,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渠道。

(一) 坚持完善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制度机制

中国共产党重视以制度机制的完善来保障各民主党派广泛参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主张和建议能够通过合法渠道进行表达。

在参政议政的内容上,1989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首次明确了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即“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6]。这对民主党派在什么问题参政,在什么层面上参政,以什么方式、途径参政作出详细界定,为民主党派更好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提供了政策依据。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中共中央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习近平总书记介绍了中共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的形成过程,他希望党外人士畅所欲言、开诚布公,发表真知灼见,对中共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7]。中共中央对民主党派意见和建议的高度重视,也为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提供更广阔空间。

在参政议政的形式上,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对政党协商的形式、程序以及保障机制进行了详细说明,并阐明了政党协商的深刻内涵和重要地位^[8],这对各民主党派有序政治参与、畅通意见表达渠道和凝聚共识具有重要意义。

在参政议政的渠道上,人民政协是各民主党派履行参政党职能的重要渠道,2022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提出政治协商工作应当遵循的四项原则^[9],进一步提高了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近年来,保障各民主党派履行参政议政职能的制度机制随时代发展不断完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决定》指出:“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政策举措。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10]同时,各民主党派也高度重视参政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都将参政议政的准则、途径、主要内容等写入党派章程。

(二) 各民主党派积极进行政治参与

“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在认同现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和制度化的渠道,按照法定的组织程序有层次地影响政府决策”^[11],而无序的政治参与不仅阻碍了政治参与主体的合理诉求表达,也会损害其他群体的合法权益。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参政热情不断提高。民主党派成员大都是各领域、各团体、各阶层中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有较高专业素养和社会影响力。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依法表达意见与诉求,对广大群众有序政治参与起着示范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各民主党派有序政治参与,将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民主形式、深化民主内涵、提升民主品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动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顺利推进。例如,各民主党派成员参加中国共产党召开的重大政策方针情况通报会,参加高层协商会,参加小范围谈心会,或以“直通车”的形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意见建议。又如,民主党派成员通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同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对口联系等形式参与决策,以特约人员身份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12]。同时,中国共产党鼓励支持各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把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使用作为政治责任,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

高度抓好落实”^[1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履行职能”^[14]。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各民主党派自觉以中共为师，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贯彻“四新”“三好”要求，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三）不断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渠道

中国共产党重视并照顾同盟者利益，将民主党派视为自己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15]。参政议政作为民主党派传递民情民意的重要方式，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需要不断创新和拓宽渠道。具体而言，就是在实践中将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渠道与加强政党协商、优化政协平台建设、强化民主监督紧密结合起来。

在加强政党协商方面，自党的十八大至 2021 年 6 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民主协商会、座谈会等，一共有 172 次，其中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有 37 次”^[16]。多种政党协商形式增强了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感和归属感，也促使民主党派更加积极地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的讨论与制定。各民主党派中央以调研报告、建议等形式向中共中央直接提出书面建议的“党派直通车”也彰显了渠道优势，从“十四五”国家规划到城市河道污水治理，上至国家规划、下至社情民意，各民主党派的真知灼见以更快的速度传达至中央，政党协商的效率持续提高。

在优化政协平台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政协组织建设，政协章程、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不断完善，政协的职能定位、组织架构和工作流程进一步细化，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持续推进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民主党派成员可通过政协提案、社情民意信息、专题协商等方式，就国家大政方针、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等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近年来，随着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发展，能够实现远程互动的线上智慧政协平台也不断创新，线上“同心圆”更加巩固。在创新参政议政形式方面，互联网、新媒体平台

为民主党派成员提供了更加多元、便捷的参政议政渠道，扩大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此外，各民主党派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同政府有关部门和政协各专门委员会相互配合，使民主监督与参政议政在创新中相互促进。2021 年，受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开展为期 5 年的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在中央统战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指导下，各民主党派积极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咨询服务、进行专题调研，形成了一批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提案，为研究和破解长江流域的生态修复与保护问题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力合作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历经风雨、历久弥新，这种合作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基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具有一元领导与多元参与、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鲜明特征。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共同的政治目标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坚定不移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17]。

（一）基于共同政治目标的通力合作

合作在政党政治中是常用策略，但在不同的政党制度下，政党之间的合作具有显著差异。多党竞争制下的政党虽然也重视合作，但却是以淡化民众利益、将政党利益凌驾于民众利益之上的合作。以西方政党政治为例，在选举期间，政党间结成政治联盟，给民众发下“空头支票”。这种合作如果成功，民众在选举结束后就被排除在国家政治运作之外，进入“休眠期”的民众亦无法约束执政党是否言行一致；这种合作如果失败，政治联盟随即解散，在选举时对民众的承诺也就不必兑现。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是基于共同政治目标的通力合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共同政治主张就促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1945年,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纲领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都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抗日战争胜利后成立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各自的主张中也表达了和平与民主的期盼,爱国、民主、和平的共同政治目标使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为建立一个新政权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政治目标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之后,各民主党派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重新修订了章程,确定了新时期的新任务,明确了新时期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即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共同的政治目标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二) 具有共同思想基础的通力合作

共同的思想基础是政党间建立互信、深化合作、实现共赢的基石,它不仅有助于减少分歧,增进共识,还能促进政党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构建更为稳定和谐的政治生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所以能够风雨同行、守望相助,是因为最初的合作就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8]。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五一口号”,标志着民主党派放弃“第三条道路”,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同时,这也表明各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各民主

党派积极投入到新政权的建设中,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各民主党派主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这一时期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共同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之后,各民主党派主动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实践中,自觉加强思想建设,不断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有了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多党合作就会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执政党和参政党就会为了共同的目标而携手前进。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共同目标。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通向幸福的必由之路,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也是多党合作的政治方向 and 目标任务。”^[19]

(三) 一元领导与多元参与、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通力合作

在西方多党竞争的政治体系中,各政党以独立的身份参与竞争,否认彼此间存在明确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也鲜有政党宣称接受另一政党的领导。因缺乏核心政党的领导而造成决策执行混乱和偏差的现象屡见不鲜。想要有效推进多党合作并协调好各方利益,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核心至关重要。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具有一元领导与多元参与、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特征,这种合作模式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又有利于凝聚共识,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一元领导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担领导重任,“团结带领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20]。多元参与则体现在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职能作用上。各民主党派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这种多元参与有助于拓宽人民群众发表意见的渠道,体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从而增强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一致性表现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形成了高度一致的政治共识,即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多样性则是各民主党派在组织建设、参政议政形式等方面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尊重各民主党派的多样性,充分保障其参政地位和作用的发挥。

参考文献:

- [1][10]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24-07-22(2)、(2).
-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2: 1.
- [3] 胡乔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560.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34.
- [5] 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4.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 人民出版社, 1991: 823.
- [7]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征求对中共二十大报告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22-10-14(1).
- [8] 中办印发《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N]. 人民日报, 2015-12-11(1).
- [9]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N]. 人民日报, 2022-06-21(1).
- [11] 刘君, 赵先寿.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优势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J]. 中国政协理论研究, 2008(4): 67.
- [12] 刘钰琦.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提升策略研究——以民建汕头市委为例[D].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2023: 11.
- [13]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2-02-24(1).
- [1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15]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 侨联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J]. 中国政协, 2018(5): 4.
- [16] 国新办举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新闻发布会[EB/OL]. (2021-06-24). <https://www.chinanews.com.cn/shipin/spfts/20210624/3478.shtml>.
- [17]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会摘编[N]. 人民日报, 2024-04-03(10).
- [18] 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N]. 人民日报, 1948-05-02(1).
- [19][20] 张献生.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M].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4: 85、89.

责任编辑: 王天海

从改革开放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基于生产力的视角

朱文琦

摘要：对生产力理论的重新思考与创新探索，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启动并顺利推进的重要原因。中国改革开放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深度关联，为理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新视角。“新质生产力”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出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标识性、原创性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深刻术语革命，赋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应坚持新发展理念，在着力解决好发展动力、发展不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问题中，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生产力；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

社会主义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表明，如何科学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中国改革开放在对生产力理论的反思中启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1]。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起点上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明确“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2]。中国改革开放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这种深度关联，为理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新

视角。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基本线索，从学理上阐释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历程与时代要求，对于深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一、改革开放在对生产力理论的反思中启程推进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向看，社会主义在价值立场、政治制度、社会治理、目标追求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全方位的，但就根本而言，“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3]。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确切地指出，无产阶级在上升为统治阶级后，

收稿日期：2024-10-22

作者简介：朱文琦，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唯物史观叙事研究”（4BKS042）、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课题（tsqn2022111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4]，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思想到实践的转化可以轻松实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在回顾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曾谈到，怎么搞社会主义，“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5]。他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式市场经济的崛起为其他文化与历史有别于西方社会的国家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榜样”^[7]。实践充分证明，对生产力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是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思想前提和必要条件。

如何理解生产力，首先应回到马克思主义文本语境中。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话语谱系中“生产力”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分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的“劳动生产力”、德国社会主义者赫斯的“共同活动即生产力”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8]。的确，“生产力”并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首创，但真正赋予其科学内涵并将其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紧密关联起来的是马克思。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概念，“生产力”有着特定的历时形态、要素构成和作用机制。第一，从形态看，生产力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是人为满足自身需要同自然界进行的物质、能量交换。生产工具是判定生产力水平的主要依据。人类社会依次经历的天然工具、手工工具、大机器、自动化机器等不同阶段，大致呈现了生产力的跃迁脉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

会”^[9]。第二，从构成看，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0]，因而生产力既内含人的因素也包括物的因素。人的因素即劳动者的重要性首当其冲，物的因素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二者合称为生产资料并在一定条件下彼此转化）是劳动者自身力量的延伸。第三，从作用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并对生产力发展产生能动的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形式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11]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生产力理论的把握，不仅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生产力理论的承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12]，还体现了对苏联模式下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批判性理解。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等系列著作中揭示了资本积累的两重性，指出资本积累加剧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不可避免地激化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由此确证了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东方国家的革命实践，他们初步探讨了非资本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问题，认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跨越“卡夫丁峡谷”。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在晚年，列宁对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进行了新思考。他明确“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13]，提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4]。后来，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模式逐渐形成。这一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历史意义不容抹杀，但其片面强调重工业、盲目追求高指标导致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失调，以及违背社会

主义生产目的、长期忽视人民经济文化需求等问题同样突出。对此，邓小平同志曾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5]

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一段时期内否认社会主义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等问题已有反思。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

“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6]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学习苏联共产党正确的、成功的经验，而非生搬硬套、照单全收。然而，由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因素，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更好发展生产力，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力理论的探索翻开了新篇章。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正确思想的基础上，立足新的时代环境和人民群众热切期盼，继续深化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提出系列新见解、新论断。对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17]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8]作为判断标准，这实际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中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构筑于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江泽民同志提出：“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

系的重要结合点。”^[19]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0]这些重要论述，将经济建设与保障改善民生统一起来，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建设的目的和归宿，强调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解决好民生问题，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综上可知，全面把握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内涵，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生产力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开创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经典生产力理论是真理，但并没有桎梏真理、终结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发，在对生产力理论的深入思考中开启并矢志不渝推进改革开放，找到了深化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二、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与新质生产力出场

至改革开放40周年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5%，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至15.2%，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等等^[21]。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改革开放是增强中国发展内生动力、激发社会发展活力的客观需要，也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和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招。

对生产力理论的重新思考与创新探索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启动并顺利推进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纵深展开又为党的生产力理论学理化阐释提供了中国语境、基本框架和时空场域。在高度评价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渐次深入，“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22]。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一些深层次的思想观念问题、体制机制问题、利益固化问题相互交织，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这

些对改革开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特别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使新时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怎样更好发展生产力等问题被提上党和国家重要议事日程。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只有‘持续创新、不断出场’才能秉持‘在场’”^[23]。一种新的思想理论或概念范畴从问世到被普遍热议、深入阐释、广泛接受,往往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反映了某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势及人民群众的真切期待。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进一步系统全面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点、关键、本质及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24]从理论逻辑看,新质生产力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是生产力自身迭代升级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中研究生产力,把生产力理解为劳动者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期变化的能力,明确生产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从一般“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二者虽然都以满足人的需求为出发点、都要同生产关系形成互动,但在“结果”“要素组合”“产业形态”“保障”“所处阶段”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25]。在此意义上,“新质生产力”已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一场深刻术语革命,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中最具改革创新精神、

最活跃的构成要素。作为物质生产实践的主体,人是生产力中唯一具有能动性的要素,离开了人、抛开了人的能动实践,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前提、生产力实践的现实样态将不复存在。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高素质劳动者队伍不断壮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人才支撑。面向未来,生产经验、专业技能、知识水平特别是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衡量现代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标志。依靠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坚持以创新为导向多措并举培育发展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在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中发展数字经济,是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时代呼唤,对劳动者的综合劳动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作出部署,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才队伍打下了基础。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加快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创新人才、高技能人才,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评价、考核、激励和支持保障体制,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

劳动资料是新质生产力中突出反映科技创新诉求、集中展示科技创新成效的构成要素。劳动资料表现为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发生关系的媒介,是劳动者将自身的体力、脑力劳动传导到劳动对象所凭依的一切物质资料和物质条件。在劳动资料涵括的所有对象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工具。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6]的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科技创新赋能生产的能源系统、动力系统、操控系统、集成系统、信息化系统、辅助系统,加快实施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一方面,在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推动下,劳动资料有了新的质态变化。另一方面,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的变革创新又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新质生产力发展。

劳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中彰显劳动生产实践的空间持续延展、范围不断拓新的构成要素。恩格斯指出：“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27]作为人们把自己的劳动加于其上的一切东西，劳动对象既可以是未经劳动加工的自然物，也可以是劳动产品，即马克思所说的“原料”——“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28]。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加大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攻关力度，科学布局未来发展新赛道，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商业航天航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推动生产力在更高层次、更深领域不断展现出新效能。中国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加快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筑牢坚实基础，为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创造了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新质生产力内含的上述基本要素缺一不可、相互依存、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29]新质生产力不仅是顺应全面深化改革趋势、包含新质态要素的生产力^[30]，而且强调生产力系统内部诸要素的耦合机制、本质联系和整体效能。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起来，充分激活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汇聚系统合力，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也是写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篇大文章的关键点、突破点。

三、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各国面临的共同历史主题。伴随着血腥掠夺和野蛮扩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

次历经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串联式现代化发展阶段，并塑造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东欧及亚洲部分国家开始工业化进程，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其间的现代化困境，特别是一些国家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而出现的国内动荡、政局频繁更迭、失业率激增、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不容忽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新进程不仅时间上比西方主要国家以及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大大缩短，而且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只有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才能掌握主动、赢得未来。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1]如何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部署“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时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32]作为发展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是否科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发展思路、发展成效。在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时，习近平总书记还专门着眼新发展理念，从创新驱动发展、城乡区域发展、改革开放、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梳理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成效，分析了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33]。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关联，内在决定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应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通过打通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补齐发展短板、弱项，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是在着力解决发展动力问题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没

有创新支撑,新质生产力也就无从谈起。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科技创新水平总体不高,创新能力还不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不足、贡献率偏低,在一些基础性、战略性技术领域还存在“卡脖子”难题。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创新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力。应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深化教育科技人才综合改革,继续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夯实基础研究、鼓励自由探索。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社会创新资源协同攻关,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加快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优化升级,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及时推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此外,还要统筹推进包括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在内的其他一切创新,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输入强劲动力。

二是在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如在经济发展结构上的“不平衡”问题以及在总量上的“不充分”问题。其中,“不平衡”问题集中表现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不平衡,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等等^[34]。这些问题的存在及交互影响,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效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35]要进一步解决好这些问题,应坚持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强化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衔接融合,推进不同生产力要素实现跨地域合理流动,加快形成区域优势互补、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的发展局面。同时,应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科学协调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关系,大力

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三是在着力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36]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从根本上达成人与自然彻底和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使得绿色发展可由理论转变为现实实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身特色 and 本质要求。坚持绿色理念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一个重要认识问题,也是一项重大实践课题。就前者而言,应牢固树立和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恪守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战略长远谋划新质生产力发展。就后者而言,应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努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让绿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更加深入人心,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四是在着力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37]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辩证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作用更加明显”^[38]。在新的开放环境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应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积极推进重点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以更为开放的视野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发展共识,加大外资、技术、管理等借鉴吸收力度,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搭建广阔平台、聚集全球资源、

提供智力支持。

五是在着力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公正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价值旨归，体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要求。在共享理念导引下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应把握共建、渐进的基本要求。一方面，通过完善制度设计、强化示范引领、健全保障体系，充分激发全社会、各层面的积极性、创造性，鼓励齐心协力创造美好生活，营造人人置身其中、个个尽心尽力的良好氛围，持续把“蛋糕”做大，不断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另一方面，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不能偏离实际、超越阶段。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稳中求进，努力把“蛋糕”分好，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际成效不断提升生活品质。

参考文献：

- [1][3][12][15][17][18][2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5、265、116、139、137、372、274.
- [2][32][35]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27-28、26-27、77.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 [5][6]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0-251、128.
- [7] 科斯.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 徐尧，李哲民，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237.
- [8] 杨乔喻. 生产力概念：从斯密到马克思的思想谱系[J]. 哲学动态，2013(8)：33.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
- [10][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8、209.
- [11][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588.
- [13] 列宁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23.
- [14]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1-382.
- [16]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
- [19]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35.
- [20]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66.
- [21]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12-19(2).
- [2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01.
- [23] 任平.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法——“道路之新”的矛盾体系与出场逻辑[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6)：6.
- [24][29][33][36][3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4-02-02(1)、(1)、(1)、(1)、(1).
- [25] 高帆.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6)：142.
-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0.
- [30] 张雷声. 用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高质量发展实践[N]. 人民日报，2024-03-04(17).
- [34] 许光建. 加快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N]. 经济日报，2018-03-01(13).
- [38] 中国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引擎——外国专家学者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N]. 人民日报，2022-03-02(16).

责任编辑：蒋建忠

人大代表家站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 价值与实践路径研究

——基于北京市人大代表家站建设的考察

赵 竞 钱周伟

摘 要:人大代表之家和人大代表联络站是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连心桥和为人民服务的主阵地,也是人大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主渠道,更是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方式。目前,北京全市范围内已建成人大代表之家 345 个、人大代表联络站 2590 个,基本实现选区和代表的全覆盖。人大代表之家和人大代表联络站的建立,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人大代表与群众不稳定的联系状态,扩展了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广度和深度,激发了人大代表的履职责任感,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发挥着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基层有效运行、丰富人民群众民主参与渠道、助力推进城市治理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代表之家;人大代表联络站

扎根人民、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也是这项制度能够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1]自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以来,通过持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在制度、组织、机制等方面的建设,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范围上更加广泛、在内容上更加真实,彰显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价

值。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级人大继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实践创新,不断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向基层纵深发展,发挥基层人大在民主协商、基层治理等方面的作用和优势,并将实践中的成熟经验凝结为正式制度,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设立街道工委的基础上,各地人大进一步将人大工作和代表履职向社区延伸。例如,2019 年,北京市人大在全市人大代表之家和人大代表联络站(以下简称“人大代表家站”)建设的基础

收稿日期:2024-12-19

作者简介:赵竞,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钱周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研究”(23AKS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上,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代表之家、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和工作的指导意见》,推动人大代表家站成为联系群众、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重要渠道。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建立基层联系点、代表联络站等方式,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听取对立法、监督等工作的意见和建议。”^[2]其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基层联系点和代表联络站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中的作用。

一、北京市人大代表家站建设的历史沿革

2001年起,北京市各区人大常委会开始在街道设立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将其作为区人大的工作机构,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延伸到街道一层,并且在制度体系完善、桥梁纽带连接、正当性与合法性保障等方面为基层治理提供了重要支撑。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诉求甚至矛盾开始出现在群众所生活的基层社区中。作为连接群众、社会、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地方人大需要为代表和群众提供常态化、固定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凝聚共识场所以及协商决策平台。2010年前后,密云、大兴、石景山等区借鉴深圳、浙江等地做法,在镇街与选区分别设立网络工作处(站)、代表联络站等,作为人大闭会期间人大代表履职、联系群众的场所,并针对场所、制度、经费等方面提出了建设要求。此后,其他区陆续开展建立人大代表家站的尝试。

(一) 试点探索阶段(2005年至2016年)

这一阶段,一些区在人大代表家站建设的场所、人员、经费等方面进行了试点性探索。例如,大兴区于2005年通过《大兴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建立代表联系网络的实施意见》,并在选区设立网络工作站,对工作站建设的基本原则、主要职责、工作程序等作出规定。石景山区人大于2010年在八角等街道设立人大代表之家,在选区设立人大代表联络站,不仅对硬件建设提出要求,还

将人大代表之家每年4—5万元、人大代表联络站每年0.6万元的活动经费纳入街道预算。除以上两区,其他区在这一阶段也开始尝试建设人大代表家站。例如,门头沟区2013年开始推进代表“双进”建设,顺义区2014年开始在胜利街道、北小营镇等建立人大代表之家。

(二) 初步建设阶段(2016年至2019年)

在试点探索的基础上,一些区开始出台区级层面的建设规定,对人大代表家站建设的功能定位、挂牌标准、履职记录、议事程序等方面提供具体指导,进一步推进规范化建设。例如,石景山区人大常委会于2016年出台了《关于加强人大代表之家和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的意见》,昌平区人大常委会于2018年出台了《北京市昌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推进人大代表联络站选民接待站建设的指导意见》,西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于2019年通过了《建立街道“代表之家”和社区“代表联络站”工作方案》。

(三) 全面覆盖阶段(2019年至今)

2019年11月,按照市委第五次人大工作会议提出的“因地制宜、就近就便、集约高效”的原则,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代表之家、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和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人大代表家站的功能、建设标准、活动内容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分别规定了市人大、区人大、镇街人大在建设中的基本职责。此后,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召开现场交流会、各区常委会领导包片调研和指导等方式,全面推进全市人大代表家站规范化建设。同时,各区、镇街也进一步制定了有关人大代表家站开展活动、人大代表联系选民事项处理办法等多项规定,并制作成手册发放给人大代表。截至2024年初,全市共设立人大代表之家345个、人大代表联络站2590个^[3],基本实现了在全市街道、乡镇、社区(村)等行政区域内的全覆盖。

二、北京市人大代表家站建设的实践探索

从全市范围来看,由于各区财政水平和编制

条件有所不同,因此各区人大代表家站在站点结构、人员配备、活动频次等方面都略有不同。各区人大代表家站立足自身特色,在活动的具体设计、站点的品牌打造、联系机制创新、问题反馈处理机制创新等方面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建设。

(一) 全员编入,覆盖全市

2019年,北京市各级人大以“万名代表下基层,全民参与修条例”活动为契机,开始向全市各街道、选区(社区)推进人大代表家站的规范化建设。从建设起步方式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由过去的人大代表工作站转化而来。例如,大兴区于2005年开始建立人大代表联络网络,成立了“网络工作总站(区人大代表联络室)、镇街网络工作处、选区网络工作站”三级工作网络,并在区政府设立网络服务协调办理机构。又如,密云区人大于2014年在镇街一级设立了人大代表工作室,在选区和村一级设立了人大代表工作站。但是,在这一阶段的建设中,并未将选区人大代表全部编入站内。

二是由人大代表个人工作室转化而来。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订后,由人大代表个人所成立的工作室大多数逐渐转化为他们所在选区的人大代表工作室,不再作为个人工作室开展履职活动。从实际情况来看,此类工作室之前一般由具有一定组织和活动能力的人大代表所建立,而在转为选区人大代表工作室后,其选址、人员配备、硬件设施等得到沿用。

三是在典型示范和市人大常委会推动下,各区及街道通过相互学习模仿,推进人大代表家站建设。“万名代表下基层”活动中,在代表人数、层级等各方面对基层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提出了较高要求。例如,需要在一定的时限内征求意见,而倾听选民群众意见建议需要组织和联系场所。这些情况促使市人大常委会加快建设覆盖全市的人大代表家站网络,并将人大代表全部编入其中。

(二) 以“家、站、点”为基本架构,尝试个性化平台建设

北京市人大代表家站基本上按照街道设“家”、选区设“站”的二级架构建设,并根据选区内各社区(村)的距离、人大代表人数,以及开展活动的便利程度等条件,灵活设立联络点。在个性化平台的探索上,主要有三类。

一是在有条件的选区,根据便捷联系的需要建立流动性联系平台。例如,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在华贸中心商务楼设立流动联络点,以满足该地区商户多,需要灵活开展联系的要求。

二是根据选区内选民人数、人大代表人数和开展活动情况,合并或增设联络站。例如,石景山区为了方便选民群众就近进站找代表,在选区设站的基础上,在有条件的社区增设站点。

三是根据所在地区民意需求和治理难点,设立不同功能的联络站。例如,昌平区分别在南口镇设立了服务型“连心”代表联络站、治理型“善治”代表联络站、发展型“惠农”代表联络站和学习型“汇智”代表联络站四种特色联络站^[4],以突出联络站功能性的方式,使站点更好地融入社区之中。

(三) 探索人大代表家站活动开展常态化机制

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场所,人大代表家站能否常态化开展联系活动,是衡量其能否有效运行的重要指标。为了规范全市人大代表家站的建设及活动开展,市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人大代表“月进站、季回家、年述职”的目标,对所有编入人大代表家站的各级代表提出了按月、季、年三个频次开展履职活动的要求。

一是将人大代表家站活动与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和市、区人大常委会监督等议题相结合。例如,在修订《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北京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等条例的过程中,均通过人大代表家站开展征求意见活动。又如,在开展《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北京市

接诉即办工作条例》等条例的执法检查时，都通过人大代表家站开展督办会、“吐槽会”等^[5]。

二是将人大代表联系活动与接诉即办工作相结合。作为支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平台，人大代表家站不仅发挥着联系选民群众的重要作用，而且通过建立问题反馈机制、协调机制等方式，也日益成为化解基层矛盾的重要载体。北京市各人大代表家站结合接诉即办“每月一题”开展活动，发挥联络站扎根社区的优势，将社区群众反映的普遍性问题转化为代表建议，通过人大的制度化表达、监督渠道，解决治理难题。例如，海淀区从区十七届人大开始，探索“委办局走进代表家站”系列活动，即由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区教委、区国资委等部门的负责同志走进人大代表家站，召开督办交流会。人大代表和承办单位就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展开深入交流，进行沟通研判，进而取得共识^[6]。又如，昌平区兴寿镇就垃圾分类标准问题邀请市、区城管委相关人员参加人大代表家站的活动，通过人大代表、选民群众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相互沟通等方式，解决因分类标准一刀切而造成的治理问题^[7]。

三是将人大代表家站活动与其他活动相结合。除了直接在人大代表家站开展活动外，编入联络站的人大代表也越来越多地参与所在社区的基层治理，如参与老街坊议事厅、小院议事会等基层民主协商议事活动，从而使代表履职融入生活化的社区活动中。这便于了解居民诉求，代表居民发声，提高居民协商能力；还能够将居民协商一致但街道无法直接解决的问题，作为代表建议由区人大交办，从而促进基层各类协商议事机制和平台发挥实效。此外，各人大代表家站还引导代表们发挥自身特长，为居民提供教育、医疗等服务性活动。

（四）建立问题处理反馈机制

让人大代表关注的问题有回声、让群众反映的问题有着落，是加强人大代表家站建设，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一环。目前，人大代表通

过人大代表家站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建议后，会面临两种情况。一是有些问题能够通过社区、街道或人大代表所在单位解决；二是有些事项需要将群众的意见、建议转化为代表建议进行交办。为了规范问题处理的方式、流程并监督问题处理的过程和结果，一些区的人大代表家站尝试建立问题处理反馈机制。例如，石景山区八角街道总结了协商民主议事“七步工作法”，即“提起、审议、沟通、协商、实施、督查、归档”，形成了问题处理的闭环。又如，朝阳区朝外街道为人大代表家站探索出“分类定轨”方法，按照“居民诉求、代表建议、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监督办理、群众满意”的工作机制，跟踪建议办理情况。

三、人大代表家站对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功能

（一）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基层运行提供载体

在人大代表家站建立前，一定程度上存在人大代表联系群众不够密切、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来看，制度运行在街道、社区缺乏“落脚点”，群众联系人大代表渠道不够丰富，较难找到具体联系方式，也很难见到代表本人。从人大代表角度来看，一些人大代表在联系基层群众的时候，被动联系多、主动联系少，联系基层群众的形式单一，沟通也不深入。部分人大代表通常只参加所在选区人大常委会组织的立法调研和执法检查等活动，自己进入选区、进入社区联系群众较少，联系群众的广度和深度不够，进而提出的意见建议缺乏普遍性、代表性。从选民群众角度来看，部分人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代表的性质、地位、作用不了解，或者在自己熟悉的生活圈中找不到联系人大代表的方式。上述问题不仅影响人大代表履职成效，也制约了地方层面立法和监督工作的质量，从而影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运转。在人大代表家站建立后，各级人大代表就近编入其中，代表们

能够带着议题，在人大代表家站中同社区群众有序有效沟通互动，扩大了立法、监督和治理工作的“基层民意池”。这有助于人大代表在更广泛、更真实、更接地气的意见中提出建议，并带到人大会议中展开协商，保证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充分进入立法、监督和决策过程中，从而为发挥好人大重要作用、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重要载体。

（二）为扩大人民群众民主参与提供渠道

在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要主动顺应人民群众表达意愿、有序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新要求，“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8]，让人民群众参与到立法、监督和治理当中来。通过人大代表家站，代表们在进行立法调研和执法检查的过程中，不仅有了机制化的保障，而且能够充分地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在法律的制定出台过程中，通过人大代表家站了解、倾听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和利益诉求，有利于法律的制定及实施。因此，人大代表家站成为城市治理中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连接的关键点，成为人大代表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是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地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9]的重要抓手。通过加强人大代表家站的建设，能够更好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以充分表达，并使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能够有序进入党委政府的决策和工作中。例如，2019年8月20日，石景山区人大代表到第六选区人大代表联络站，针对《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修订，围绕生活垃圾是否强制分类、是否对违反分类投放要求的单位和个人设定罚则等内容征求意见、建议，有40余位社区居民、10余位社区工作者、2位物业代表、6位社会（餐饮）单位代表参加这次活动。大家提出了建立可操作性垃圾分类指导细则，以及根据违法程度及频次进行梯次处罚等建议。在地方层面立法、监督的意义上，人大代表家站有助于提高基层群众在地方立法工

作中的参与度，有助于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三）为城市治理提供助力

城市治理的重心在基层，需要密切联系群众，把握群众需求。人大代表家站有助于人大代表定期听取选民群众的诉求和意见，就有关问题及时形成建议案。同时，人大代表家站有助于进一步拓宽民意表达的渠道，起到了下情上达、开阀减压、促进和谐的作用，延伸了人大监督的触角，进一步打通了人大基层民主的“最后一公里”和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有了人大代表家站，代表们在服务选区和原选举单位的过程中，就有了常态化的机制，有了固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这使人大代表的活动在基层社区不断线。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整套城市治理体系中，人大代表家站作为制度性平台能够把上下的意见结合起来，给群众的意见表达和沟通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并有助于推动基层治理从“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方向发展，进一步提高治理效能。

四、人大代表家站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进一步优化的路径选择

由于存在建设水平不均衡、知晓度不高、活动议题吸引力不足、平台数字化运行滞后等问题，人大代表家站要更好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还需在统筹规划、规范化建设、协调联动、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进一步进行完善。

（一）加强统筹规划，做好人大代表家站宣传

一是统筹规划人大常委会、专委会核心业务和人大代表家站活动。编制包括年度上下联动项目、立法意见征求、执法检查、建议办理等在内的“一本帐”，作为人大代表家站活动的任务清单，从而提升活动的计划性和规范性。同时，分月制定人大核心业务进站计划清单，细化各级人大代表进站履职的各项要求。此外，在区级层面打造通过人大代表家站联系基层群众的品牌活动，以活动促建设。

二是扩大宣传，提升人大代表家站及其活动的知晓率和辨识度。充分利用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线下线上宣传、通知板块，刊登、转发人大代表履职情况和人大代表家站活动信息。充分发挥市、区人大常委会宣传部门的指导作用，用选民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对人大代表家站的运作方式、功能定位，活动主题及目的，解决问题的典型案例等进行宣传，提升其影响力和辨识度，进而提高群众参与度。

（二）以规范化建设推进人大代表家站提质升级

一是完善组织架构，优化站点分布。可进一步充实人大代表家站联络员、信息员力量，并充分利用大数据，在预判群众需求的基础上提前谋划活动，提升人大代表家站整体运行质效，更好发挥其功能。进一步优化站点设置和编入人大代表的数量，着眼于方便选民群众，综合考虑选区群众的数量、站点与社区的距离、人大代表进站的比例等因素。同时，可在各联络点加挂立法联系点，在商圈、企业、律所、医院等处设置立法联系点，以充分听取和全面收集群众关于立法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拓展群众参与立法的广度和深度。

二是总结先进经验，以示范促规范。相关调研发现，虽然不少地方都打造了特色品牌活动，但从总体建设情况来看，依然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对此，需及时总结各地人大代表家站建设中形成的各种经验，通过召开全市性和全区性的建设推进会进行推广，以示范推广提标准、促规范。同时，在考虑可行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建设要求，通过考核评估验收等方式提升人大代表家站建设水平。

（三）以人大代表家站促进协同联动

一是推动政府和“两院”力量下沉。从全国各省市的经验来看，政府和“两院”同人大代表共商活动，是为人大代表家站赋能的重要形式。例如，浙江等地的人大代表家站开展了“代表·局

长面对面”和“一府一委两院”进站等活动，进一步畅通了人大代表与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渠道。可在年初，以基层群众和人大代表的建议清单为导向，向相关办理部门征求进站意向，制定进站计划，把进站活动纳入人大代表家站年度活动计划，形成人大与职能部门协同工作的格局。

二是提升群众参与效能。针对专业性较强的立法征求意见活动，可以通过发放问卷调查、制作意见模板等多种方式开展，让选民群众在选项中提供偏好，在模板中填写意见，从而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群众无话可说。同时，可设置人大代表家站和人大代表“微码”小程序，使人大代表家站联络员、人大代表和群众在小程序内实现信息同步。这一方式不仅能够降低群众参与门槛、实时反馈民情，还能促使人大代表主动了解民情。此外，在人大信息化建设相对成熟时，“微码”小程序可以直接接入相关信息化平台。

（四）加快信息化履职平台建设

一是建立履职数据目录体系。在信息化平台中，可根据目录录入人大代表基础信息数据、主题活动数据、各类议案建议数据等，实现各类履职数据的综合汇集。根据数据属性，分类建立更新机制。例如，主题活动数据库随时更新，议案建议根据办理环节流转情况进行更新，代表基础数据每季度更新等。

二是实时同步建议办理情况。在信息化平台上，为建议编号并添加建议办理流转示意图，对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人大代表家站联络员、人大代表、建议办理部门工作人员和提出建议的群众代表进行分级授权，根据授权情况开放建议办理情况的进展流程，形成办理处置闭环。

三是加大人才供给，实现信息化供需对接。随着数字化建设的加快，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大。可在人大内部培养既懂业务也懂技术的信息化人才，打通业务与技术间的屏障，提升信息化平台的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28.
-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 人大工作常用法律汇编（2023 年版）[G].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3：133.
- [3] 人大代表进家站 答好赋能基层治理“关键题” [N]. 北京日报，2024-01-15(3).
- [4] “四型”代表联络站里听民意 [N]. 北京日报，2024-01-15(3).
- [5] “吐槽会”开到了家门口 [N]. 北京日报，2022-08-01(5).
- [6] 海淀人大：届首之年，这些“首次”很亮眼！ [EB/OL]. (2022-11-08). 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211/t20221108_320306.html.
- [7] 昌平区兴寿镇开展“人大代表履职、助力双碳目标”主题研讨活动 [EB/OL]. (2023-11-30). http://www.bjrd.gov.cn/xwzx/gqrd/202311/t20231130_3328805.html.
- [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9.
- [9] 习近平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 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 [N]. 人民日报，2019-07-19(1).

责任编辑：王天海

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演进及实践路径

徐子轩

摘要: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救国、兴国、富国和强国大业中不断探索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成功推进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文明蒙尘到重焕荣光的伟大转变。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演进脉络,总结与提炼历史经验,指明新时代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实践路径,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理论的思想指引,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辩证统一,坚持巩固文化主体性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地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发挥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筑牢民族复兴的文明根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积淀着中华民族创造的璀璨文化。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扭转中华民族文化凋敝、文明蒙尘的历史命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重任,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延续,还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因此,回顾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程,明确建设人

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路径,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基于这一重大论断以及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性,学术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展开了系统性探讨。

在理论层面,相关研究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

收稿日期:2024-11-16

作者简介:徐子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政党协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及优化路径研究”(22CKS0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是什么。代表性观点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统一体^[2]。也有学者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实践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一体的文明形态^[3]。还有学者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出的文明之花^[4]。

在价值层面,相关研究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价值意蕴进行深入探讨,回答为什么要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关键问题。代表性观点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凸显了中国的主体地位^[5]。还有学者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 21 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类文明观^[6]。

在实践层面,相关研究对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理路进行深入探讨,回答怎样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重要问题。代表性观点认为,要研究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7]。有学者指出,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必须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勇毅前行夺取新的胜利^[8]。也有学者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身蕴含着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应然与实然的内在张力^[9]。还有学者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历史性、现实性和未来性的统一^[10]。

基于前述研究,本文旨在从整体的、历史的视角出发探讨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有哪些具体实践;二是新时代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路径。

二、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演进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萌芽酝酿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

建立了新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挽救贫穷落后的中国,不断深化对文明的理解,重振中华文明自信,开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

第一,揭示资本主义文明虚伪本质,深化对文明的理解。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的态度和开阔的视野,逐步揭示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本质。李大钊认为,“在资本制度下的文明越进步,劳动者越受苦痛”^[11]。在揭示资本主义文明虚伪本质的同时,李大钊开始展望建设“第三新文明”。他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12]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第三新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即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推翻旧文明,才能创造出新文明。

第二,深化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坚定文明自信。李大钊认为中国已对人类的进步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发出了“第二次之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13]的时代之问,坚信中华民族能够在世界文明潮流中建立崭新的文明,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毛泽东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14]1939 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15]在文明蒙尘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并未全盘否定中华文明,而是强调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以及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的贡献,坚定中华文明自信,牢牢把握创造文明新形态的根脉。

第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938 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他认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6]1940 年,毛泽

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7],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共产党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马克思主义,牢牢把握创造文明新形态的魂脉。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初步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重振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信,积极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破除残留的旧社会陋习,奠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条件和物质基础。

第一,资本主义文明观的“破产”,重振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信。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他强调:“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18]同年9月,毛泽东宣布:“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9]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深化了对资本主义文明弊端的认识,重振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信。

第二,积极开展文化教育工作,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教育改革,以文化教育推进建设文明新形态。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20]这从根本上规定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首要问题和根本任务。1950年,中共中央号召“全国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技术人员、教师、学生和一切在文化领域内工作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们,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努力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提高人民文化水平而奋斗”^[21]。1954年,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要求,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培养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此外,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扫除文盲的工作,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识字教育,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容易掌握科学文化知识。

第三,破除残留的旧社会陋习,树立社会主义文明新风气。社会风气是时代的风向标,也是保障社会平稳运行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着力塑造新中国崭新的社会风气,领导人民在全国范围内移风易俗。1951年,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中指出,“在旧社会生活过较长时间,会带来很多旧的东西,要求一下子把旧的影响肃清,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能求得进步”^[22]。1952年,中共中央指出,要“教育工人改正旧社会遗下来的恶习,在自觉的基础上加强劳动纪律,保护国家利益”^[23]。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社会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解放少数民族旧社会制度对生产力的束缚,彻底改变了社会各方面的旧面貌,树立社会主义文明新风气。

(三) 改革开放时期:深化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文明新形态迎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不断深化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知。

第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扫除思想障碍。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充分论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24]同样,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

才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坚持这一思想路线,扫除思想障碍,不断深化对文明形态的认识。

第二,大力建设物质文明,同时强调“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一系列成就。1979年,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强调,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5]。此后,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关系的认识。

第三,深化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识,拓展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识,强调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6]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27]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是“两个文明”取得显著成效后,党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体现了文明建设理念的日趋成熟。

(四) 新时代:全面展开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这一时期,“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成果显著,文明自信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明确以交流互鉴和“第二个结合”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一,确立“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理念,逐步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五位一体”的基本格局。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总结文明建设的科学规律,提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28]。这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念上走向成熟。只有“五个文明”协调发展,才能

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五位一体”的基本格局。

第二,文明自信达到新高度,坚定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决心和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29]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重要场合的讲话,都在大历史观的视野下,联系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来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强调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时代篇章。

第三,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和“两个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华文明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30]。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31]。坚持“第二个结合”从根本上守住了马克思主义“魂”,筑牢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重任,在实践中更好地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中国共产党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路径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理论的思想指引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经验表明,新时代应该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坚持“两个结合”,确保人类文明新形态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一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百余年来的实践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兴旺昌盛,人类文明新形态就会蓬勃发展。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党

和人民的事业就会偏离正确的前进方向，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就会遭遇重重困难。二是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指导具体实践。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立足于中华大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在坚持“两个结合”的基础上，突出强调“第二个结合”的原创性意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不仅在内容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更重要的是实现价值观上的契合，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化的价值生命力，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雄浑的文明底气和力量。

（二）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辩证统一

坚持党的领导是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保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力量源泉，两者辩证统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取得的伟大成就，彰显了“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的特殊优势，而保持这种优势，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两者的辩证统一。

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既是百余年来党带领人民实践的宝贵经验，也是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要求。坚持党的领导能够确保我们始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保证人类文明新形态朝着正确方向前行。坚持党的领导本质上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促进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二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的力量是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不竭动力。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原动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要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人民心声、人民诉求，使人民群众高度认可，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

（三）坚持巩固文化主体性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相统一

一方面，中华文化主体性生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只有巩固好文化主体性，才能增强人民的文化自信，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支撑。另一方面，文明交流互鉴是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动力。只有秉持开放包容的精神，不断吸收人类其他优秀文明成果，才能做到文明和谐共生，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一是努力巩固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植根于延续五千多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32]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领人民创造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坚持文化主体性，既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又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以“两个结合”提升文化自信的主体意识，巩固文化主体性，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汇聚文化力量。二是不断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具有开放包容的特质，在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发展繁荣。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在交往互动中彰显文明理性和开放包容的大国风范^[33]，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借鉴吸收其他文化中的精华。这不仅能够推动中华文明历久弥新，还能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我们应秉持开放包容的精神，融通各种优秀思想文化资源，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丰富滋养。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83.
- [2] 孙代尧. 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J].

-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5): 22.
- [3] 王岩, 吴媚霞.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理路[J]. 思想理论教育, 2021(11): 12.
- [4] 陈金龙.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四重意蕴[J]. 广东社会科学, 2021(6): 5-6.
- [5] 沈湘平. 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基于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的视角[J]. 哲学研究, 2022(4): 5.
- [6] 杨金海. 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的深远历史意义[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1(7): 16.
- [7] 侯惠勤. 论人类文明新形态[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2): 5.
- [8] 王伟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J]. 哲学研究, 2022(9): 11-12.
- [9] 田鹏颖, 李雨珊. 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指向[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1): 3.
- [10] 刘日明.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与人类文明新形态[J]. 哲学研究, 2023(2): 15.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一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372.
- [12][13] 李大钊全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311、312.
- [14]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三—一九四九): 上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54.
- [15][16][17]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23、534、663.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二十六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504.
- [19] 毛泽东文集: 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345.
- [20][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一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10-11、212.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二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441.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三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67.
- [2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71.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387.
-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70.
- [2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334.
- [29]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98.
- [3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525.
- [3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N]. 人民日报, 2023-07-02(1).
- [32]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23(17): 9.
- [33] 朱晓楠, 戚如强. 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话语建构的理与路[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4): 22.

责任编辑: 王天海